

突破网络封锁 寻找真实世界

翻墙软件获取方法

电脑版 <https://git.io/fgp> <https://git.io/umexe>

安卓版 <https://git.io/fgma>

<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温馨提示

用国产浏览器可能打不开这些网址，建议使用IE、Edge、Chrome 或火狐等浏览器。

了解更多真相，请访问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五千法轮功学员排字 民众赞叹景象完美

2019年5月18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市总督岛举行排字活动，排出巨型法轮图形和“真善忍”三个大字，场景壮观。民众赞叹：“蓝天白云，黄衫绿草，背景是纽约的高楼大厦，互相映衬，美得绝无仅有！”

明慧期刊
MINGHUI

天地 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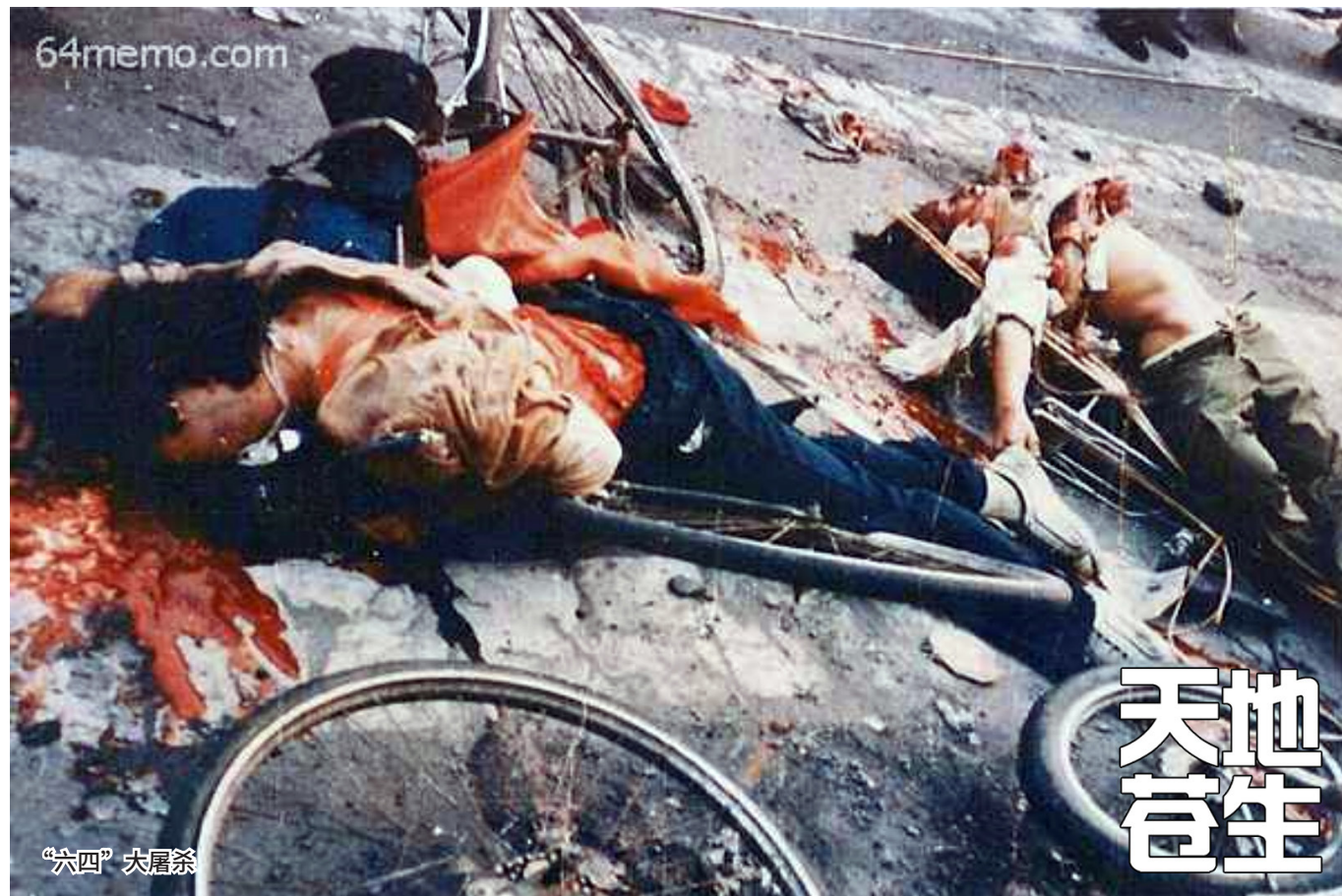
中共 暴政

一百年来
中共暴政致使
八千万民众非正常死亡

2019年10月

特刊

www.minghui.org



揭露中共罪行

中共暴政

卷首心语

- 1 生命不容漠视

血色档案

- 2 富田事变和肃“AB”团
- 6 延安整风的历史碎片：整疯、整死、处决

红朝解密

- 9 中共建政后为什么还要暴力土改
- 12 难以置信的长春围困战
- 15 1.4万中共“志愿军”战俘拒回大陆

史海钩沉

- 17 “右派死亡集中营”——夹边沟
- 19 大饥荒期间，鲜为人知的中共高层“特供”
- 21 湖南道县文革纪事

历史回顾

- 24 “六四”大屠杀实录

从未有过的邪恶

- 28 缅甸远征军史连长的红朝遭遇
- 30 证人指证 法轮功学员徐真遭活摘器官死亡
- 31 秘密进行着的人体试验

明慧人权报告

- 34 明慧人权报告：二十年血腥迫害

掸却封尘

- 37 他们晚年为何忏悔
- 39 三亿人三退 预示中共解体

www.minghui.org



三退保平安

退党团队方法

- 热线电话：
 - 美国：001-702-873-1734 001-866-697-6570
 - 001-858-609-9088 001-858-609-9099
 - 001-888-892-8757
 - 加拿大：001-416-361-9895 001-514-342-1023
 - 001-604-276-2569
- 海外传真：001-201-625-6301 001-510-372-0176

- 电子邮件发表声明：
tuidang@epochtimes.com
- 网页投稿：
大纪元退党网站 tuidang.epochtimes.com
海内外三退人士，化名同样有效。



组织的三退大潮。

14年的时间，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三退的总人数已超过3亿。

实际上，有大量没有加入过中共组织的民众，也都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和流氓本性，认同“真善忍”普世价值，从内心已经彻底抛弃了中共。他们都将拥有美好光明的未来！

前奥运游泳名

将黄晓敏 2004年12月

12日发表退党声明。她说：“最

近看到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社论，让我认识到了共产党的真实面目，我深为自己曾经是共产党的一员而感到耻辱。”

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25人集体声明退党。他们在声明中写道：

我们是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各个不同部门的官员，我们中有“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有中青年在职官员，有正副部级、局级、处级官员，有一般科员和普通官员，也有博士、硕士研究生。我们大家同意借《大纪元时报》退党专栏，刊登我们的退出共产邪灵的声明。因为工作、生活、家庭、父母、子女等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写出真实姓名，所以以下众多的退党人员的姓名全是笔名、化名。其实据我们所知，中共中央党校2000多职工中，90%的党员如果条件允许都会退党。

孙延军先生曾以访问学者身份被中共派到美国从事宗教心理学研究。孙延军于2009年2月14日，在大纪元网站以真名公开退党，并声明辞去一切官方职务。

他说：“专制不除，灾难不已；中共不灭，天理难容！”2010年他在集会上又说到：“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邪恶、最丑恶的一幕。是当代人类的最大耻辱。善恶有报，中共专制暴政在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孽中也



耗尽了能量，面临着崩溃覆灭的结局。而法轮大法的庄严、慈悲、圣洁、美好，有乾坤作证，为人神共见。他将引导人类走向复兴之路，永世流传。”

明慧网刊登的《一百零八名警察三退名单的来历》，据说是一位明白真相的政法部门官员递来的这份名单。

无数事实证明，大批中共党徒的三退、亿万民众的觉醒，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中共的末日正在来临！天灭中共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中共的解体不久就会到来

2017年11月18日，《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继《九评》13年后问世，该著述向世人系统深刻地分析并揭示了“共产邪灵”通过破坏文化、败坏道德而毁灭人类的天大阴谋及终极目的。

现在在世界范围内讨伐“共产邪灵”的大潮正在形成，共产主义的末日、中共的解体不久就会到来！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在结语中这样告诫世人：“五千年大戏已经接近收场，人类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共产邪灵此时魔乱人间，造成了人类史上空前的浩劫。除了直接致上亿人于死地之外，更加可怕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全球，共产主义因素弥漫世界，造成人心魔变，直接排神、反神，这将使世人丧失被神救度的最后机缘。”

“对中国人来说，只要能让善良的本性战胜邪灵的诱惑和陷阱，坚决地脱离魔的轨道，人们就会看到，山还是中华的山，水还是中华的水，国还是中华的国，中国人却不再是共产邪灵掌控的马列子孙，而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中国人不仅可以拥有神赐予的富裕生活，更有内心的平静、祥和与幸福；中国也会真正繁荣强大，享有神授予的力量和荣耀，再现历史的辉煌。天地永固，生生不息。”



生命不容漠视

古罗马戏剧家泰伦提乌斯说：“哪里有生命，那里便有希望。”亚里士多德认为生物是物质的产物，但只有在超自然的、超物质的“活力”激发下才能转变为“活”。

生命的美好与神秘，如同宇宙的永恒一样，让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产生无限敬畏之心。哥白尼赞叹：“当人类看见上帝管理下宇宙的庄严秩序时，必定会感受到一种力量，摧迫自己趋向规律的生活，去履行各种道德，并可以从万物中认出造物主上帝确是真善之源。”

传统文化讲“天地人”三才，天造万物、人杰地灵。人的生命弥足珍贵，古代明君圣主无不敬天崇善，施仁政、为百姓祈福。故有汉光武帝“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的治略，亦有唐太宗览图禁杖、纵囚归狱的美谈，更有赵匡胤“不杀士大夫”、太祖三誓之善政。“惟德动天，无远弗届。”五千年传统文化德昭天下，化育众生。在中国人骨子里，善恶有报、积德行善、德高福厚是普世价值。

共产主义来了，鼓吹用暴力砸碎整个旧世界，建立人间天堂。早在1927年，中共毛泽东公开宣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自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占据了“道德”至高点，革命就是打家劫舍，杀人被完全合法化。

中共的粉墨登台，掀开了中国人被无尽凌辱与屠杀的血腥历史篇章。在共产邪恶能量的加持下，中共极权一路杀，延安整风、土改、镇反、反右、文革、“六四”大屠杀直至迫害法轮功。七十年来，中共暴政致使八千万民众非正常死亡。

可能有人说，哪个政权不杀人？但中共的杀戮与正常政治生态下的政权杀人有着本质上的诸多不同：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是顺应天象、新旧更替，而中共却是以革命的名义杀人越货，用革命代替天命；杀人是为了建立政权，而中共建立政权却是为了更大规模的杀人；暴政杀人必将违反民意，而中共却靠暴政立威，裹挟骗取民意，纳中共投名状上贼船；冤有头债有主，有了仇敌才去杀人，而中共是没有仇恨也要制造仇恨，一家人也要找出个阶级敌人来，杀亲表忠，党内也要进行肃反残杀。

杀人总要有个是非对错，起码也要有个犯罪动机，党文化灌输人们爹亲娘亲没有党亲，党让杀谁就杀谁，党说谁有罪谁就有罪；古来士可杀不可辱，中共杀精英，诛身先诛心，舆论造势，百般侮辱，要你认罪伏法，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杀人终属暴政，逆天造业，中共鼓吹无神论，杀人光荣，杀人最革命，迫害是工作……

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和生命力，中共杀戮国人的同时包藏了摧毁传统道统文化的欺天祸心，文革中毁灭传统、鼓噪斗争。经过百年的杀戮与荼毒，如今的中国人在党文化的蛊惑下，恣肆暴戾、好勇斗狠、涂炭生灵，漠视生命。拜恶者为尊，谁狠谁领头，谁流氓谁吃得开。

然而，生命不容漠视。人类是万物之灵，世上几十亿人鲜活的生命，犹如庞大天体中不停旋转着的无数颗璀璨耀目的星星，无时无刻不在诉说着生命本身的辉煌，展示着创世主的伟大智慧。

“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在共产主义行将就木，走入穷途末路的今天，本期特刊揭示中共暴政罪行，历数中共红朝一路杀的惊天罪恶，旨在唤醒中国人可贵的善良本性，维护生命尊严，抛却恐惧，重拾生命的原有本性。

《天地苍生》编辑部

血色档案

富田事变和肃“AB团”

作者 武德山 大纪元 / 编辑 甄言

中共于 1921 年成立，1927 年在南昌起兵，自立国中之国，公开对抗国民政府。1930 年底至 1931 年底的一年间，中共进行了第一次内部大屠杀，而毛泽东正是用这份投名状，获取了共产国际的认可，也使毛获得了“党内”的绝对权威。

有研究者说，毛泽东杀“AB团”，使斯大林学到了怎样彻底消灭所有他不信任的人。称斯大林为老师的毛泽东，也做了一回斯大林的“老师”。

肃反“AB团”是中共内部杀戮的开端，直接为各根据地肃反运动的乱打、乱杀开了先例。中央苏区累计有 10 万红军在肃反中被自己人屠杀。

凭空发起 无反肃反

“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AB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国民党内的反共者于 1926 年底在江西成立的反布尔什维克组织，1927 年 4 月解散。

1930 年秋，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进驻吉安城，听说中共赣西南特委有“AB团”组织，毛不问情报来源，大做文章。

11 月 14 日，毛泽东写信给省行委，信中提到红军所需的油、盐、米的供应，省行委不能及时送到。毛认为江西省行委负责人李文林是有意破坏红军作战，11 月底，在宁都县的黄陂，毛泽东下令把李文林当成“AB团”嫌疑犯抓了起来。

李文林是赣南红军和苏区创始人，1930 年 2 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他和当地干部对毛泽东的独断专行等做法不认同，抵制过毛泽东。

李文林被逮捕后，毛于 12 月 3 日起草了《总前委致省行委信》，信中把前委与行委的平行关系擅自改为上下级关系，还说：“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酷刑逼供 屈打成招

12 月 7 日下午 3 时，26 岁的李韶九举着毛泽东授予的“尚方宝剑”，带着一个连的兵，来到省行委所在地富田，命令武装士兵将省行委机关包围，率十余人闯入省行委办公室，将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以及各方面负责人李白芳、刘万清等一一逮捕，挨个刑讯逼供。段良弼不承认自己是“AB团”。李韶九命令士兵脱去他的衣服，让其裸身跪地，然后用香烧身，烧得他体无完肤，两个大拇指也被打断了，人残废了。

李韶九办案，不招供不停刑。据当时的资料记载，被害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受审者熬不过酷刑，只好乱供，“AB团”越打越多。

肃“AB团”酷刑（网络图片）



三亿人三退 预示中共解体

截至 2019 年 9 月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党、团、队）总人数已突破 3.4 亿。三亿余人三退预示着中共解体的来临，预示着一个没有共产邪灵控制的中华民族的新纪元即将到来。

《九评共产党》敲响了共产党的丧钟

2004 年 11 月，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在全世界首次全面系统地揭露了共产党的邪教本质。大量详尽的、无可辩驳的、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将共产党的丑恶嘴脸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共产邪灵祸乱世间百余年，中共作为邪灵在世上的代表，以其流氓本性和血腥暴政，祸乱中国，危害世界，共产邪灵妄图毁灭全人类。中国乃至全世界各国很多民众已经认清共产党的本质，迅速觉醒，自我救赎，远离邪灵。民众觉醒之时，

就是邪灵解体之时！

《九评共产党》发表后，中共江泽民一伙吓得胆颤心惊，始终不敢正面应对《九评共产党》的讨伐，只能装聋作哑，自欺欺人。中共在网络限制词条中，把《九评共产党》摆在了第一位，可见中共已经吓破了胆。

民众三退大潮 势不可挡

觉醒的民众开始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跳出恐惧的枷锁，放弃了对共产党的一切幻想。《九评共产党》开启了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

父亲为她安排的出国留学的机会，24岁那年接受中共党组织的安排，成为中共安插在父亲身边的一名特工，她背叛疼爱自己的父亲，为中共窃取了傅作义卧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中共得到她拍摄的胶卷，称之为“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而傅冬菊也被中共称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

但傅冬菊在北京的晚年却十分凄凉，一直住在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里，拿不出钱买房改房，病危之际中共当局都不让她住高干病房，她不得不住自己掏钱的特需病房，由于负担不起特需病房的开销，护理她的人关键时刻甩手走了。傅冬菊曾说，想写一本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没有动笔，她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为时已晚。

西方亲共人士的醒悟

《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曾冒险和古巴卡斯特罗接触，卡斯特罗对他大谈自由民主宪政。后来，马修斯将独裁者宣传成了“反独裁”的英雄形象，在美国引起轰动。美国《民族评论杂志》曾登出一幅漫画：卡斯特罗笑眯眯地坐在古巴地图上说：“我通过《纽约时报》找到了工作。”

埃德加·斯诺要比马修斯走得更远。1936年，他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去了延安，他在那里采访和体验到的都是提前预设好美化中共的镜头，结果

《红星照耀中国》用一面之词美化中共，欺骗了美国与世界，也诱骗了国内青年大批投奔延安。斯诺夫妇1970年访华时，受到了帝王般的待遇。那时，毛泽东对他说感谢日本皇军的侵略，中共才有机会占领大陆。斯诺这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内心对中国人民充满歉意。

斯诺夫人随后成了中国人权活动最坚定的支持者。1989年，她强烈谴责中共制造了六四屠城。2000年，79岁的斯诺夫人去给一位知名人权活动人士捐钱，等待她的不再是中共领导人，而是20多名便衣警察。他们把斯诺夫人完全包围了起来，秘密地对她进行拍摄，阻止她会见那名人权活动人士。

迫害者须悬崖勒马

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的迫害长达20年，初期很多人对这场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治运动毫无辨别能力，加之本身不信任，中共用谎言和小利使恶人助纣为虐。但随着法轮大法弟子广传真相，许多人也渐渐明白而停止迫害。那些紧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人却遭到恶报。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年中有多达20000多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遭恶报，其中包括被殃及的亲友等4000多人。在遭恶报形式的分类统计中，死亡人数最多，高达7000余人，占总人数的35.6%。在对遭恶报人员所分的九大类中，公安系统本人作恶遭恶报的最多，高达4500多人，占公安系统总数的26.5%，他们殃及的亲友也最多，高达千人。

通过粗略统计还发现，在遭恶报的20000多人中有300多人在遭恶报后，通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开始醒悟，有的睁一眼闭一眼，不再参与实质迫害了，有的调离原单位，不参与迫害了，有的明白真相后病很快好了。

希望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不要像他们一样遭到恶报才醒悟，也不要像傅冬菊一样到晚年才忏悔，停止迫害，才是为自己负责的明智之举。

天

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关押的丈夫，也被李韶九当作“AB团”抓起来施以酷刑。不仅“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对她们还有专门的刑法：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毛泽东在他后来写的《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把这些屈打成招的供词拿来当做他打“AB团”的证据，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

杀人狂潮

12月9日，李韶九根据乱供的名单又抓了25人，还没来得及审问，就赶上国军空袭，慌乱之中，李韶九下令将这25人绑赴郊外，一律枪杀。

从12月7日晚至12日晚，富田事变之前的5天时间里，李韶九对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机关120多人进行了刑讯逼供，先后拉出去处决了40余人。中共萧克上将回忆说：“一打一审，他们都承认了，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来，再打再审，又供几十个。当时的江西卷起了杀人狂潮。”

据1932年5月的一份秘密报告：“一切工作

当年关押“AB”团的江西吉安王氏宗祠



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使用的刑罚计有120多种之多，坐轿子、坐飞机、猴子牵缰、剖腹剜心、铁丝穿睾丸等等。数万人丧生。

在严刑逼供下，逼出了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第一次喊出打倒毛泽东的武力反抗

李韶九这个连还被毛派往红二十军抓“AB团”，逮捕了该军的所有指挥员、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逮捕的人中有名声显赫的174团政委刘敌。当指控刘敌说他是“AB团”成员时，刘敌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已在红军队伍里战斗这么久了，我全家人都被白军杀害了。”刘敌被释放了。

12月12日，刘敌带领一营官兵包围了李韶九驻地，李韶九闻讯逃走。他们缴了李韶九带来的一个连士兵的械，释放了被李韶九当“AB团”关押的70余名干部，离开驻地。这就是所谓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当晚，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第二天上午，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反毛士兵大会。愤怒的士兵们喊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他们公开打出反毛旗帜，到处张贴反毛标语。张贴的《告同志和民众书》中，指责毛泽东有“皇帝思想”，宣称“党内大难到了”。

江西省委发出通告，称毛“极其奸猾，个人意识极差，英雄思想充满了脑筋，对同志素来是命令主义、恐吓手段、惩办制度”，经常惯用政治手段来打击同志，“把党组织作为他个人工具利用”。通告称毛想做“党皇帝”。

当红一方面军一部赶来镇压时，红二十军3000多人，带上1000多件武器过了赣江。

周恩来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

12月17日，富田事变发生后5天，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前往镇压，陈毅随后也前往红二十军

斯诺夫人（左）2000年4月与六四难属苏冰娟短暂会面



驻地进行调解。红二十军释放了被他们抓的人。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局，项英代理书记。项英倾向于以内部矛盾来处理富田事变，不同意将富田事件定为叛变，而是定性为内部“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除对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进行适当处理外，其余人员免于追究。

富田兵变的四名主要领导人，遵照项英的指示，“向党承认错误，请求教育”，后来被分配了新工作。至此，一切平息，毛也不得不有所收敛。项英以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份成为苏区最高领导，制止了毛的屠杀。

据海外《新史记》文章介绍，“富田事变”爆发后，1931年2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曾做出两项决定：一、立即给江西发一中央训令，要求“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二、重新调整中共苏区中央局人选，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由早先赶到苏区的项英继续负责中央局工作，把当事人毛泽东后移一位，由任弼时代替他的位置。

2月20日，项英用内部问题的方式解决富田事变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现，周恩来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宣称：“赣西南的‘AB团’是反革命组织”，并声称，还有军队中的“不坚定分子”，也可能“为‘AB’团所利用”。

1931年3月18日，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副局长米夫的主持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确定了激进恐怖路线，即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一切剥削者。

3月28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这个决议比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决定，调门还高一些。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项英的意见被排斥。已经扩大化的苏区肃反，进一步加剧了。



富田村随处可见的“反对反革命的富田事变”标语

然后，周恩来派出邓发，打入红军总司令部任保卫处长，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组成“全权处理富田事变”中央代表团。他们到达江西苏区后，夺了项英的权，支持毛泽东继续肃“AB团”。李韶九被重新起用并委以更高权位。

4月17日，主张同红二十军谈判的项英被解除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毛泽东取而代之，不久毛成为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即当时红军的最高领导人。

4月18日，红二十军将已经承认错误并作了检讨的刘敌等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全部逮捕，押着巡回示众，不久即全部处决。

7月，红一方面军派兵包围红二十军。红二十军先被调至江西南部平头寨，7月23日，红二十军被彭德怀和林彪率部包围缴械，除林彪认识的一名副官和当时支持肃“AB团”的原红二十军军长外，包括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在内的700余名副排长以上的军官全部被杀，仅谢像晃和刘守英两人逃脱。红二十军番号



李韶九

他们晚年为何忏悔

编辑 甄言

当人们还唱着红歌，追忆战斗中的青春岁月时，殊不知一些当年誓死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著名人物却在深深地忏悔。

张学良兄弟的悔恨

在中共唆使下发动西安军事政变的张学良，在很多人看来是千古罪人。正是他的幼稚之举，使蒋介石剿共功亏一篑，并使中共借抗战时期发展壮大，最终窃取了政权。而政变后被中共抛弃的张学良也看清了中共的面目，并对自己的所为深表后悔，在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同样受中共欺骗的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却是在临死之前才幡然醒悟。

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四弟，少年时即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1933年秘密加入中共，受中共派遣到廊坊东北军67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中共建政后先后任东北大学校长、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张学思还几次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仕途一帆风顺。

然而，文革爆发后，张学思被批执行刚刚被打倒的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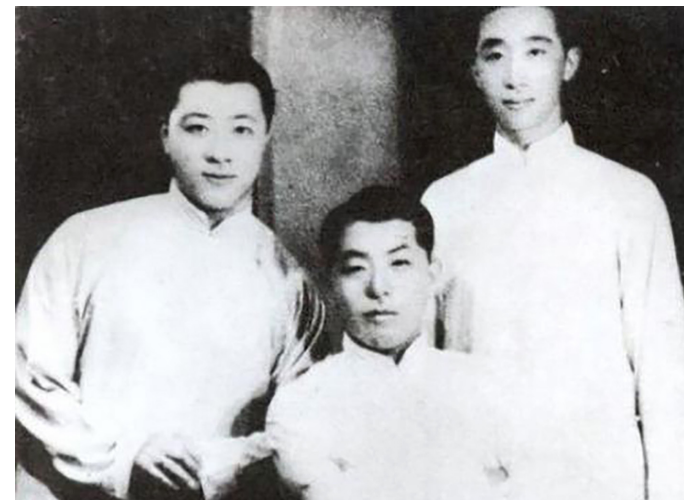
其交代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免职后被关进营区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小房间。在关押期间，张学思还给周恩来写信称自己不是叛徒，但没有任何回音。1968年，张学思住进了医院，因迫害严重于1970年离世。

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已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上了中共这个恶魔的当所致。

傅冬菊出卖父亲傅作义，晚景凄惨

抗日名将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年轻时舍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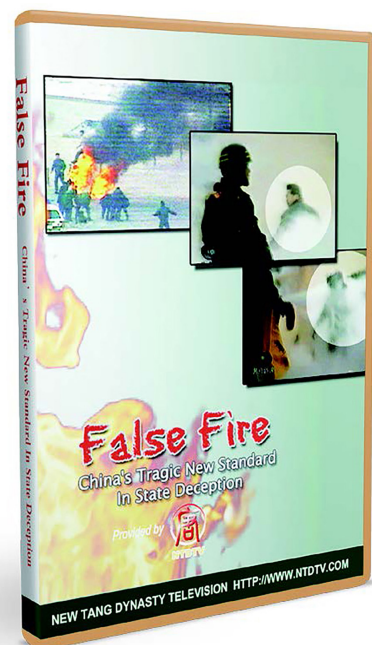
张学良与二弟张学铭（左）、四弟张学思（右）的合影



晚景凄惨的傅冬菊



伪火



2003年11月8日，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伪火》荣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节荣誉奖。该片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自焚”案的诸多疑点，从而证实该案是中共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

1 自焚者之一刘春玲被烧死？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慢镜头显示，图1：刘春玲身上的火已被扑灭时，有人用重物猛击她的头部；图2-3：刘春玲双手不自觉地护卫被打击部位，随即倒地，被打弯的重物从刘春玲脑部快速弹起；图4：一名身穿大衣的人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保持用力姿势。

2 穿便服进入烧伤者隔离室？



刘思影重度烧伤，要严格消毒隔离，减少感染机会。怎能允许记者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手拿话筒进行现场采访呢？而且刘思影是在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第4天，就接受央视采访的。难道，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的医务人员不懂得医学常识？

3 塑料瓶子烧不坏？



电视上的王进东，浑身烧得焦黑，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

有人专门做了个实验，用汽油烧塑料雪碧瓶，点燃后，5秒瓶子开始变软，7秒收缩变形，10秒缩成一小疙瘩并燃烧。可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雪碧瓶不但完好无损，连颜色都未变，翠绿如新。这该如何解释呢？



1931年，瑞金中共苏区中央局部分委员合影，右二为毛泽东。

被取消，残部并入红七军。

各根据地的反“AB团”运动从此演变成大规模屠杀。有的整县整乡的党员领导被当作“AB团”分子拉出去枪毙。在肃“AB团”运动中，红军其它各军和总前委都遭到了肃整。朱德司令部5名副官中有3名被杀，红军中先后有1万人被害。中共江西省委行委，闽西特委机关几万人被诬陷丧命。很多干部遭到逮捕杀害时，为了节省子弹，“处决”手段是用大刀、梭标和木棒。

在《总前委答辩信》中，毛泽东自己承认，仅一个月的时间，在他统领的红军中，就“破获”“AB团”4400人以上，占到九分之一。地方党政机关比例更大。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接替代理书记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但是几个月后，周恩来继续反过来“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1932年5月，李文林仍以“AB团”的罪名被错杀。

整个苏区成了漫天血雨的红色炼狱，仅死于邓发一人手下的官兵，就数以千计。一批让毛泽东没能杀掉的高级将领，如二十军的后期军长

萧大鹏，前、后两任政委曾炳春和陈东日，文官何笃才，以及江西地方党魁李文林，均死于周恩来“加紧肃反”的屠刀下。

肃反“AB团”是毛泽东、周恩来凭空一手发起的，直接为各根据地肃反运动的乱打乱杀开了先例。也是中共内部杀戮的开端。

“反‘AB团’是正确的，错误只是扩大化”，这种结论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1991年，中共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

目前，中共承认当年的反“AB团”运动中绝大多数被处决者是无辜的受害者，所谓的“AB团”并不存在。根据中共党内各种文献，毛泽东和周恩来应对此负主要责任。当时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周恩来，为了“贯彻”来自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所谓“反右倾”的指示，将富田事变错误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使“‘AB团’肃反运动”上升为中共中央的决策。

评述

据萧克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这么多。由于被杀的红军太多，长征出发前，苏区五个月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从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20%。毛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人被官方追认为所谓的“烈士”。

黄克诚当时担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他在其《自述》中对自己在清查“AB团”运动中的作用感到五内俱焚。他说：“如果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的这一颗人头就是不足以抵偿的。”

延安整风的历史碎片： 整疯、整死、处决

作者 玉清心 大纪元 / 编辑 甄言

一批又一批爱国青年抱着抗日救国的激情来到延安，却在延安整风中遭受精神和肉体的迫害。据中共党史资料记载，从1942年2月至1943年12月底，延安的知识分子总数四万多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披露：“1943至1944一年内，仅小小的延安就清出特务15000人。”

1942-1945年，毛泽东发动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经过了整风、肃反、抢救、复审三年的整风，毛清除了党内王明苏联国际派，夺取了中共最高领导权，并且用恐怖、暴力洗脑，绑架了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继续革命。延安整风运动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被后来历次政治运动延用。

一批又一批爱国青年抱着抗日救国的激情来到延安，却在延安整风中遭受精神和肉体的迫害。迫害的情况，绝不象毛泽东1943年8月说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据中共党史资料记载，从1942年2月到1943年12月底，延安的知识分子总数为4万多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披露：“1943至1944一年内，仅小小的延安就清出特务15000人。”

许多人被逼疯、逼死，或象王实味那样的“托派”、“叛徒”、“特务奸细”被成批处决。据文献记载，整风进入高潮的“抢救运动”，直接导致了数千人的死亡，自杀成为摆脱恐惧的唯一出路。下面只是摘取部分作者的相关文字。

把人整疯

陶铸和妻子曾志都在整风中受到无情打击。曾志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记述：“一位女



延安整风中秘密处决的王实味

同志被打得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红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每到夜晚寂静时，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静悄悄地，传出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屈打成招，延安遍地特务，人人特务，康生说‘延安各机关已是特务如麻’。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现出6岁的小特务！”——韦君宜，《思痛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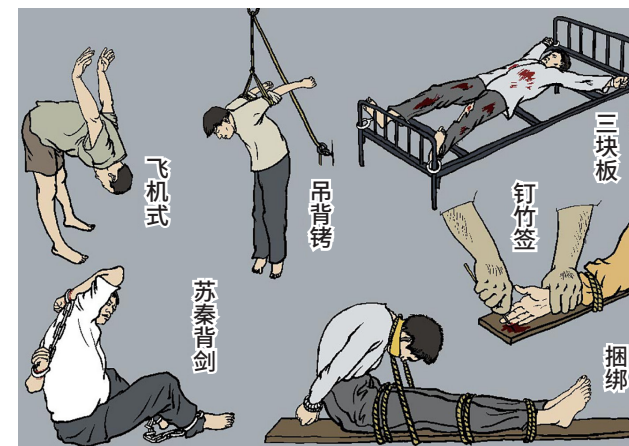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一般干部更是受到冲击。据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的曹瑛回忆，蔡畅领导下的中央妇委一名余姓女同志，年龄尚不足二十岁，就被认定参加了“红旗党”。为“抢救”她，特在杨家岭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头天晚上开大会，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非说她参加了‘红旗党’不可。大会不断高呼口号，也有谩骂的”，会议主持人威胁道“不坦白，加倍治罪”，但是小余“死也不承认”。正在病中的吴玉章听说这件事，拄着棍子来到会场。年高德劭的吴玉章见到这种斗争场面，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害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明慧人权报告”)，所收集的迫害案，还只是明慧网收集信息的很小一部分。

“明慧人权报告”中的这些案例显示，中共对法轮功人权的迫害是全面的。从城市到乡村，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覆盖了中国大陆：安徽省、北京市、重庆市、福建省、甘肃省、广东省、广西、贵州省、海南省、河北省、黑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内蒙古、江苏省、江西省、吉林省、辽宁省、宁夏、青海省、陕西省、山东省、上海市、山西省、四川省、天津市、西藏、新疆、云南省、浙江省等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有：政府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军人、警察、法官、检察官、律师、高校老师、学生、教授、专家学者、企业家、工程师、艺术家、医护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媒体记者/主持人、中专/中小学教师、工人、服务员、离退休人员、农民、个体户、个体小商户、下岗工人、自由职业者、道士、僧人等等，可以说涵括了中国所有的职业。

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从事的行业：教育、科研系统，政府机关，农林牧业，五金、交电、轻工、陶瓷、塑料制品、工艺品等其它行业，还有铁道/交通运输、纺织、金融保险、糖烟酒食品、电水煤、汽车制造、钢铁、电器电子、邮电，文化传媒，文学艺术，航空航天、军队武警、油田、矿业等等中国所有的行业。



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男女老少都有，涵括了从婴儿到80-90岁老人的各个年龄段。有各类社会精英，中共对老人、未成年孩子、孕妇、残疾人都不放过。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有派出所/公安局或者610办公场所内；看守所或拘留所内；劳教所/教养院(2013年解体之前)内；监狱内；法制学校/精神病院/黑监狱内；地方政府的一些设施之内，等等。

根据明慧网20年来积累的报道，我们对中共种种酷刑进行大致分类，如：毒打、电刑、药物与精神迫害、强制灌食、熬鹰(不让睡觉)、吊刑、铐刑、桎刑、饿刑、禁止排泄、锥刑、约束衣、强制堕胎、捆绑刑、体罚、冰冻、摧残伤口、利用动物摧残、鞭刑、闷蒸、烘烤、火烧、烙烫、开水、热油浇、拖拽、坐刑、水刑、绑刑、性虐待、关监、奴工等等。每一类可能包含多种酷刑，例如，吊刑有单手铐吊、双手铐吊、门框悬吊、铁丝吊铐、吊铁环、拉伸吊铐、倒着吊、上大挂等；铐刑有手脚连铐、掏腿铐、大背铐(背剑、大背剑、苏秦背剑)、锁地环、超时床上铐、穿心镣、拇指铐、单人铐、双人铐、多人铐、桎铐等。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超过100多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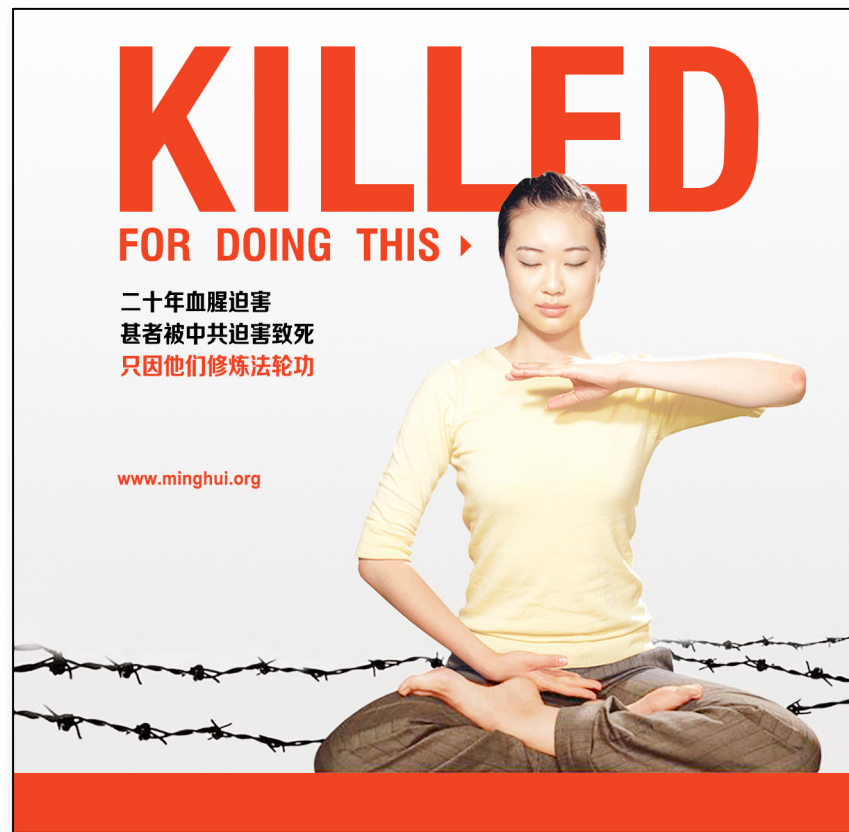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了巨大生命财产的损失。截止到2019年7月10日，明慧网突破中共的层层封锁收集和核实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有4322件。这远远不是实际发生的迫害致死案例的全部，只是冰山一角。太多的案例仍然被掩盖，尤其是大量的活摘器官的案例，因为中共焚尸灭迹，仍然没有被揭露出来。

此外，在明慧网已查证的案例中，截止到2019年7月10日，有86050人被绑架，28143人被非法劳教，17963人被非法判刑，18838人被绑架关入洗脑班，809人被绑架进精神病院，各种酷刑迫害的总人次518940。中共的迫害造成了太多的法轮功学员广受歧视、失业、失去收入、长期遭受精神迫害、家庭破裂、伤残、死亡。☠

明慧人权报告

二十年
血腥迫害

编辑 山河



停止迫害法轮功

明慧网于2019年7月11日，发布《明慧二十周年报告》。

根据明慧网的信息来源，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1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一人多次被抓算多次）至少为250-300万。其中主要涵盖4种情况：第一、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非法设立各类洗脑班，以法制教育为名剥夺人身自由、强制精神改造；第三、极度滥用劳教所的所谓“劳动教养”（被废止）；第四、滥用刑事诉论法（包括拘役、有期徒刑，在看守所、监狱遭迫害；司法拘留，关在拘留所遭迫害）。

更有成百万、上千万为不牵连家庭、邻里、工作单位而隐姓埋名，为法轮功上访的法轮功学

员，被抓捕并转移到秘密集中营，成为中共搞科学研究的活体实验对象以及器官移植的活体供源，残缺的遗体被就地火化。这部分受害者的名单和详细案情暂时还无法列入上述统计，但我们相信，这场现代群体灭绝迫害结束之后，会有更多知情人站出来举证。遭受中共活摘器官和人体药物实验的法轮功学员的案情仍在收集和整理中。

由于中共的这场迫害是党、政、军、医疗、公检法相互联手、各取其利，它们从始到今一直在极力掩盖其罪行、严密封锁信息，因此明慧网收集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侵害的报道只是这场大规模迫害的冰山一角。即便如此，20年来，我们依然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由于篇幅所限，《明慧二十周年报告》之《法轮功学员人权受迫

他哭着劝说道：“小余呀，你就承认了吧。”最后，小余被迫承认自己参加了“红旗党，是特务，来延安是搞破坏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李锐此时任《解放日报》国内部编辑，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因“托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讯，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出李锐是他的“上级”。1943年4月，在边区第一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锐被捕。——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共产党此次‘抢救’削尽了一个作为人底尊严，一个作为党员的尊严——逼迫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奸细、堕落、无耻的行为等——这也是堕落了它自己的尊严，以至对它蔑视的冷淡，因为它对构成自己的份子蔑视，也就因轻贱蔑视了它本身！”——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下卷第681页。

“那些被‘抢救’过的人，全有愤不欲生、哭、恐惧的经历，落头发、死底恐惧准备等。”——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下卷第436页。

逼得自杀

……隔壁窑洞放风时，我总是听到一个脚上戴镣的犯人走路时哗啦哗啦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犯名叫魏伯，因跳崖自杀未遂，被戴上脚镣。魏伯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方成，《我在延安被“抢救”整风运动的真相》

插画：延安整风



《解放日报》报社有一位总务科科长，是河南人，挨整受不了，刎颈自杀，本来已经抢救过来，可康生还是说他是河南的“红旗党”，是死特务。这个同志听说后，把纱布扯掉，终于死了。——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一次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因柯庆施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李富春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随即柯庆施就被捆绑起来。在批斗高潮中，柯庆施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虽然柯庆施没有被押往社会部，但对他的监视并没放松，柯一直被软禁在家中。——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一个徐悲鸿的得意学生，为了追求真理来到延安，却以“政治嫌疑”为名，头脸蒙上黑布被捕到保安处，他受不了刺激而得病，无人照顾医治最终死亡。……平剧院一个唱花脸的，吊死了自己；青年剧院有两个人也自杀死了。——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

萧军好友李又然说鲁艺的抢救情形：“抢救中有的上吊，如今绳痕宛在，吞石子，杜矢甲跳过井……”——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

萧军好友高阳：王XX在抢救时，如何逼死了一个弹三弦的青年上吊，而后带气活埋；一个青年用手枪自杀；一个女人打落了裤子，逼着女人和他恋爱，坐在他腿上写供状……——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下卷第725页。

历史图片：人人过关



1945年9月萧军见到在保安处囚禁了3年的高阳，后者讲说了“那里面”无法无天的悲惨情形：一个东北女人“十五分钟”回答罗迈的“有问必答，言必对题，禁止耍死狗”，她上吊了。罗迈还说她是“死特务”……——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下卷第756页。

张郎郎在《大雅宝旧事》中记述了延安鲁艺画家石泊夫先生家破人亡的悲剧：画家石泊夫，上世纪30年代和周扬一起在上海是左联的战友。石泊夫突然被人说是国民党奸细，他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白，但在场的周扬没有为他说话。于是他被他当作国民党特务抓走了。夜里，他的妻子把窑洞的门窗都堵严实后，点着取暖的炭火盆。一夜过去，两个孩子和她一起“长眠不醒”。第二天领导周扬在操场宣布：“她这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还把孩子都拉去和自己一起去死，可见她对党和人民仇恨有多深。”

秘密处决

曾被誉为抗日“爱国五青年”的荫克义，整风中以“特嫌”被单独看管，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共撤退前，和其他“政治犯”被一起成批处死。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说，确实有特务嫌疑的“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叶飞将军说：“我们杀了很多叛徒，所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走革命道路。”——Jean-Louis Margolin 著，郭国汀译，《中国：通往黑暗的长征》。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来龙去脉》中披露出不少受害者被秘密杀害。例如对党内“托派”的处死方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活活打死、集体枪杀、集体活埋、任凭狗咬，以及用木榔头把脑壳砸烂等。

这些零星的历史碎片，令人触目惊心，足以

证明延安整风的罪恶。上述只言片语，主要是从当事人回忆录中摘录下来的。亲身经历者，对那段经历的悲惨和丑恶都刻骨铭心。反思历史是为了警示后人，真相迟早会大白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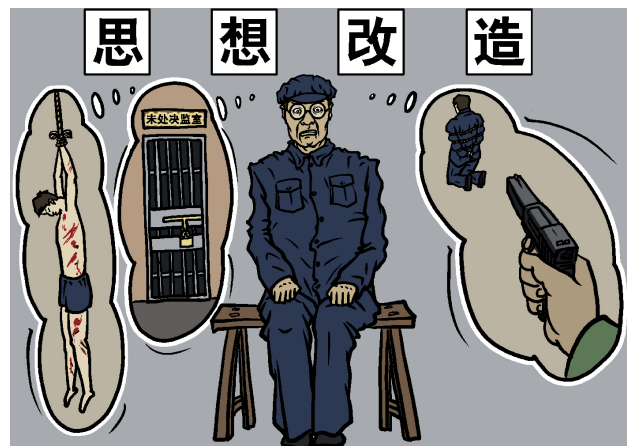
中共一直把延安描绘成“革命圣地”，把延安整风当作中共的“伟光正”历史放到教科书里吹嘘。而实际上，延安整风这段历史是中共的禁区，历史档案是机密，因为里面藏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丑恶。从延安整风走过来的人都有同感：延安整风是文革预演，文革是一场大的延安整风，可见延安整风运动遗祸无穷。

结语

通过延安整风，中共发明和试验了一套整人模式，为中共建政后如何掌控国家、钳制民众的思想，如何改造人性使之绝对臣服，积累了大量经验。例如，霸占话语权宣传洗脑、“引蛇出洞”、指鹿为马、无中生有、欺骗诈供、恐吓利诱、酷刑折磨、反省“坦白”、“现身说法”、检举揭发、通过发动群众斗群众拉更多的人卷入运动充当共犯和替罪羊、不断制造恐怖升级、先杀灵魂再杀肉体、采取激烈暴力手段达到目的后平反道歉、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篡改历史……等等。这些经验成为中共历次运动的样本，在其70年的统治中反复使用，日趋精细完备。

天

插画：诛心



家人由于听信中共的谣言和庸医的诱导，将当时还身处哺乳期的曹苑茹强行送进保定精神病医院。

大夫一听她是炼法轮功的，很兴奋地说：“把病人留下，你们走吧，我们有办法对付她。”

第二天，曹苑茹即被打打了毒针后摧残致死。尸体全身青紫，鼻孔与嘴角有血迹，血呈乌黑色。家中亲人悔恨莫及。

曹苑茹被迫害致死时，年仅35岁，女儿仅仅4个月。

看守所是一个“人体实验室”

郭宝阳，2012年时19岁，是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是年4月2日，他被青岛水清沟派出所所以修炼法轮功为由绑架，关押7天。期间被强行抽血，给他的饮食中下了毒药。

7天回到家后，药效开始显现，郭宝阳出现精神失常、大小便失禁、头痛，出现撞墙、跳楼等行为。他每天发作数次，其母悲痛欲绝，寸步不离地守在儿子身边。

据郭宝阳恢复神志后的回忆，青岛大山看守所好象一个人体试验室，给被关押者做试验，下药、释放不明气体等，然后观察受害者的反应。

据了解，青岛市“610”有计划地导演了郭宝阳发疯、自杀事件，并已事先邀请媒体记者，妄图嫁祸法轮功，向上邀功。他们指使邻居参与迫害，对郭进行监视；派其小学同学以关心为名，打探情报，诱其自尽。但郭宝阳数次被母亲救助，恶人药物迫害的阴谋终未得逞。

领导在灌食现场观看

锦州教养院的狱警们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不断引入新的毒计如灌食药物、打毒针，进行人体试验。

灌食前，狱警将学员双手臂固定在铁椅子的俩扶手上，用铁环扣紧，将两腿固定，用皮带勒住，用铁环扣紧两脚，把整个人死死地固定在铁椅子上，不能动。

狱警把中指粗的用来洗胃的管子插进学员胃里后，拉出来再插进去，以此折磨学员；当把学

员折磨得死去活来，全身痉挛后才灌食。灌进去的是气味难闻、有药味的东西。

当狱医和狱警灌完食后，用特大的针管往学员的肚子、腿上各扎一针，之后将学员拖进“小号”（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狭小、阴暗的屋子）。

约过十几分钟后，被灌食的所有学员都开始拉肚子，几乎提不上裤子，呕吐两个小时后奇渴无比，有的被折磨得几乎休克，大睁着不能动弹的眼睛。

狱警对学员受折磨后的情况一一仔细记录，疑是实验药物迫害的开始。此种迫害从2000年10月开始，特别是在2005年，还有两名上级部门的领导在灌食现场观看。

曾被注射此药物的法轮功学员有史宝东、王舟山、王文清、王贵令等。

人体药物试验的又一佐证

2003年5月至2006年6月，时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兼任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

据《辽沈晚报》消息，2005年6月9日凌晨5时，特派锦州记者来到“研究中心”，现场目击“通过注射对死刑人员行刑的全过程”。

该中心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罪犯的死亡过程、健康人药物注射前后的生命体征变化、毒物注射后各个器官的毒物残留情况、人面对死亡的心理改变……药物致死后人器官的移植、毒物现场抢救等方面都会因为这些数据而获得重要帮助。”

从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王立军在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所研究目标为如何取得“更新鲜的活体器官”：先把人打针“弄死”，研究尽可能延长死亡时间，然后迅速取出所有器官，用缓冲剂洗，冲走毒针的残余部分，然后移植到受体身上。而这种试验曾做了几千例。

王立军的研究项目《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被“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授予“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并资助科研经费200万元。王立军曾下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赶尽杀绝”。

天



刘道权



曹苑茹



郭宝阳

到180滴，甚至接近200滴。一女警说：“输快点，不管这么多，输死就算了。”

有个年轻的李主任对刘书荣说：“你死了就算了，国家最多花掉425元就解决了（拉到火葬场的费用）。把你进行人体试验又怎样？这都是国家政策允许的，是合法的，是上面的指示。”

据悉，这种毒液汁可以顷刻置人于死地。刘书荣当时每时每刻都在死亡线上挣扎，被折磨了一个月。

家住重庆高新区白马山奇峰自由湾小区的法轮功学员邓富寿曾被劫持到永川监狱。2011年底，邓富寿头皮突然大面积溃烂，后慢慢结痂。头皮溃烂那段时间，眼睛又突然失明。2012年初，他突然离世。从邓富寿突然出现的异常情况看，他极有可能被狱警做活体试验、下毒所害。

2007年11月，靠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的薄熙来被调任重庆市委书记后，将其帮凶、原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也调到重庆。两人狼狈为奸，步步升级迫害法轮功。

在2008年1月至2012年2月，薄熙来在重庆期间，重庆地区直接或间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4人；被枉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为41人；被劫持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为213人；遭绑架（枉法判刑和非法劳教的除外）迫害的法

轮功学员有568人次。

重庆企业家4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道权被冤判8年后，于2015年1月被绑架到重庆市永川监狱。监狱每天迫害他，对他使用不明药物，致使他身体肥胖、行动不能自理，生命危在旦夕。

重庆“610”、重庆市监狱局和永川监狱害怕担责任，非常恐慌，给他办理了保外就医，并在2018年1月25日将他送回到沙坪坝区家中。

医院主任要“研究”她的病情

王桂兰，原为黑龙江大庆石化公司机修厂防腐车间职工，于2001年在市第三医院（精神病院）受迫害。某主任知道她是法轮功学员后，坚决不同意她出院，表示要研究其病情，之后给她注射了不明致命药物。

王桂兰的身体随即出现严重异常现象，流口水、口舌麻木不听使唤、心脏剧痛以致满地打滚，生不如死。被迫害半年多出院后，王桂兰几乎成了一具躯壳，没有记忆和正常思维、不知孩子的名字、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于2011年10月21日，含冤离世。

精神病院大夫：我们有办法对付她

曹苑茹，河北省涞源县丰乐村法轮功学员。

中共建政后 为什么还要暴力土改

作者 古玉文 大纪元 / 编辑 君健

毛泽东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绅权。”毛在早期的农民运动中的这个表述，贯穿了整个中共发迹史。

“翻身先翻心” 颠覆传统普世价值与道德伦理

租地种田要交地租，租房住要交房钱，贷款要付利息，这是社会常态与经济常理。要把这事说成是欺压、反动，正常人不会接受。有农民质疑：“向地主要地，把别人腿肚子上的肉割在咱身上能行吗？”

儒家文化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佛家讲因果报应，前生造孽今生贫困，前生仁德，今生富贵。人们普遍认为“人凭良心，虎凭山”，动地主土地是丧良心。“刨树要刨根，翻身要翻心”，中共要让农民造反，就要颠覆传统的价值与道德观。

于是中共引入所谓剥削理论、算账和阶级斗争学说，颠覆了自古以来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普世之道。仇恨被无限放大，贫穷变成了斗争资本，有产即是犯罪。

土改工作组进村首先要划“成分”，确定“地富反坏右”。然后与“苦主”一同吃住，拉近感情。一屯一屯地做，在太行山区，这被称之为“蝗虫政策”。



“斗地主”

广西柳州柳城县六休乡杨泰木，工作人员算出他40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10万斤稻谷后，他激动地跳起来，一心想着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

天上掉馅饼，总有些让人手足无措。抢劫成“正道”，总是有那么点匪夷所思。为了进一步扫除思想障碍，东

北工作组让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的游民做骨干。

2013年2月17日，山东寿光县营里镇孙河南道口85岁的孙玉吉老人回忆当年村里斗地主时道：“二流子偷东西连小我5岁的弟弟都知道。……他指着孙健仪（编注：地主）鼻子说就是这些剥削阶级，喝血吃肉，说完还打了老人家一巴掌，真不是东西。这个混子后来还当了民兵队长，……没少造孽，1969年被雷劈死了，无子无女，真是报应啊。”

斗地主现场：干部鼓动 痞子冲锋 精英成亡魂

尽管农民通过诉苦“翻心”了，要发展到动手打斗乡绅，还是有些畏难的。这就需要中共精

心策划批斗现场了。

工作组要预先演练，在人群中不同位置分布队员，设计引领口号、挑起会场群众氛围，布置苦主边哭边诉。村里的二流子、村痞往往成为斗地主的主角，打起人来狠辣、无所顾忌。在干部鼓励、武装压阵、群众激愤、二流子兴势、苦主哭诉的特定氛围中，酷刑与死人成为革命欢歌与成果。

湖南省溆浦县八区区长郭静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个恶霸地主站在台上被斗，贫雇农一个个上台诉苦斗争。一个苦大仇深的雇农，诉苦诉得大哭起来，走过去就将那地主的右耳朵咬下一半，‘呸！’一声吐在台上，台下的群众吓了一跳。”

2007年，学者张英洪在调查湖南溆浦县土改时，讲述了一个地主遭群众“凌迟”的案例：批斗现场干部向五九大声广播：“赞成枪毙陈老二的鼓掌！”顿时掌声雷动。杜元富抽出手枪对准陈老二腿部就是一枪，士兵们接连几枪毙了陈老二。随即苦大仇深的群众，纷纷割其耳朵和鼻子，剖膛取心，割肉下酒；有个士兵一刺刀挖出陈的眼珠子，猛然用脚踏破，眼液四溅。不过一袋烟功夫，陈老二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广袤的中国农村有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孕育，村中的乡绅拥有资产与土地，他们好学勤作，乐善好施，温良恭谦，德高望重，肩负着架桥修路、兴乡办学、社会救济的责任，是乡村中的精英。改朝换代，皇权更迭，然而县制以下基层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仍需要他们来担当。这样的人群其实跟政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更不会危及到谁当政。

土改中，中共处心积虑要打倒的就是这样的人。“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绝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民国开国英雄杨载雄是湖南澧县县城桃花源人，参加过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孙中山曾亲书“陆军三等龙虎章少将”匾给他。1951年土改时被枪毙。



安仁中学的前身是文彩中学

宣传洗脑，抹黑地主形象

自古“文以载道”，中共讲文艺为政治服务。地主被打倒，还要“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南霸天一定要霸道，黄世仁一定要凶狠，刘文彩一定要残暴，周扒皮一定要刻薄。靠剥削发家，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居朱门深院，性情骄奢淫逸，直到今日，恐怕不知真相的中学生心目中的地主形象还是这些。

真实的地主是怎样的呢？

1992年，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乡——中共四川大邑县县委做过一项民意统计，主题是“历史上谁给本县贡献最大”。第一人是刘文彩。尽管经过几十年的颠倒黑白的宣传，刘文彩扶困济危、慈善办学、兴修水利、开路架桥的故事仍在老百姓中流传，乡亲称他是刘大善人，碑文刻“慷慨好义，有燕赵豪侠风”。

1995年，县长金嘉祥准备恢复“文彩中学”校名，遭到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压制，民意统计结果被打入冷宫。

1958年10月，中共组建专业班子编造《收租院》污蔑刘文彩。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特意到虹桥村14组找到长工谷能山，因谷身材健硕，“艺术家们”准备把他塑造成反抗刘文彩压迫、宁死不屈的英雄好汉。

没想到谷说：“我在他家吃得非常好，三天

秘密进行着的人体试验

编辑 晓慧



山东省平度市38岁的张付珍，2001年被绑架进山东平度洗脑班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据目击者说，警察将她的衣服扒光、头发剃光，强行按倒成“大”字形，绑在床上，长时间折磨、侮辱她，之后给她打了一针。她痛苦得就象疯了一样，在床上挣扎着，直到死去……

整个过程，“610”（专职迫害法轮功机构）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

明慧网2010年11月20日刊登的题为“两件血衣与一份机密文件”一文中，披露了一份中共2001年11月24日的“密件”，上面写有对法轮功学员“还必须采取药物治疗的方法”。

“密件”题为“范方平同志在全国劳教系统教育转化攻坚战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范方平时任中共司法部的副部长（1999年2月至2006年5月），管辖监狱、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范的讲话实则体现出中共的迫害政策。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于2006年12月1日发表的《关于中

国司法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从2000年至2004年，中共司法部发表了十几份官方文件，要求其下属的监狱管理局、劳动教养管理局和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等部门积极参与同法轮功的“斗争”。

在“610”人手一册的所谓《反X教内部参考资料》里，关于对法轮功学员“转化的实施方法”写道：“必要时可用药物介入，采用医药方式和临床实验方针达到科学转化之目的。”

据明慧网2015年1月不完全统计，在黑龙江省被迫害致死的766位法轮功学员中，仅在明慧网报导的案例中至少有70位学员是被药物致死的。

重庆永川监狱：人体试验是上面的指示

曾担任重庆大足县龙水镇某小学校长的刘书荣，于2008年5月20日被劫持到永川监狱医院。

2008年，永川监狱出笼了一份全年度的计划，为了确保全国“先进”单位的称号，要把所谓“转化率”、“巩固率”保持在95%以上。奥运期间，监狱更把迫害法轮功学员作为首要任务。

永川监狱教科科长王某、医院正副院长李某、杨某等合伙策划，制定出一个阴毒的方案，在刘书荣身上做人体试验，看其承受力有多大。

刘书荣被固定在病床上，被用食管强行灌输毒液，每天4瓶共2000毫升，每分钟速度为150

机密

范方平同志在全国劳教系统
教育转化攻坚战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0、药物治疗。依照心理测验、行为观察和结果，确定切实有心理疾病的“法轮功”劳教人员，在矫正的同时，还必须采取药物治疗的方法，才能

（四）、建立心理档案

“法轮功”劳教人员的心理档案是劳教单位

证人指证

法轮功学员徐真 遭活摘器官死亡

作者 林澜 新唐人 / 编辑 晓慧



来自重庆的访民邓光英，曾向海外媒体曝光，2011年她被关押在重庆女子劳教所期间，见证法轮功学员徐真被强制摘取器官而死亡。（视频截图）

时年46岁的徐真，曾是重庆合川电力公司职工。2011年9月底，她因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而被关入重庆女子劳教所，连续十几天遭受酷刑。

邓光英：“是我亲眼看见是这样的，他们把徐真抓上来就使劲疯狂地打，把全身都打肿了！然后叫她写出捐献器官的自愿书，她不写；不写就把她全身扒光，用一个小小的机器把嘴巴摁起，摁起之后用矿泉水瓶子，灌了十瓶水。”

邓光英是2011年在街头卖水果时，和城管发生冲突而被劳教。她和徐真，都被关在劳教所四大队。

2011年10月20日，邓光英被狱警体罚直到凌晨，突然清醒地听到劳教所四楼，传来徐真的惨叫声。

邓光英：“她在被挖眼睛的时候是2011年10月20日凌晨2点过7分，我看了钟的！她的惨叫声，轰动了整个四大队，‘它们活挖我的眼睛啊！’她的叫声惊天动地。”

法轮功学员胡英：“就是两三点吧，听到很凄惨、恐怖的一声惨叫，当时吓得都睡不着觉了，都吓醒了，我们是在2楼，（徐真）她是在4楼，就听到惨叫声，听不到她喊的是什么，那个邓光英也关在4楼，可能就看到听到一些东西。”

直到2012年邓光英出面作证，外界才得知，

徐真之死不寻常。

中国问题专家、时政评论员横河：“徐真开始被毒打的时候，是为了让她在‘自愿捐献纸’上面签字，这就说明了中共所说的自愿捐献的‘自愿’，很可能是酷刑的结果。徐真的器官到哪里去了？尸体是否交给家属了？家属看到的尸体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器官在里面？”

据大纪元网站2011年报导，徐真死后，劳教所没有通知家属。而徐真死后一个星期，该所警察喻晓华就告诉其他犯人：“事情已经摆平，不会追究。”

横河：“‘活摘器官’难查，是难查在一个政权的政权的力量在保护这些罪犯。”

究竟是谁在保护这些罪犯？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早年出访德国时，曾遭遇电话暗访，调查员称法轮功学员向德国抗议他卷入活摘器官，德国可能会降调接待规格，薄熙来愤怒之下脱口回应，活摘是江泽民的指令。

暗访者：“关于把这个法轮功这个活体摘除器官这个事情，是您的命令还是江泽民的命令？”

薄熙来：“江主席！这事你们的马大使处理不了吗？”

而整个中国，还有多少黑幕啊！专家呼吁更多知情者出面，共同制止活摘“这项前所未有的邪恶”。



土改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我吃。”“艺术家们”使出浑身解数，启发教育、煽仇造恨、金钱利诱，谷能山就是不上道，最后干脆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

不日，谷能山被民兵拉走，被强制劳改。1960年春，中共为了掩盖真相，将刘文彩庄园周围的民众发配到一个叫八管区的地方。因为环境恶劣，许多人就死在了那里。

杀人权的下放与按比例杀人

有美国学者计算中共建政后土改使450万人丧生，国内学者研究是200万到300万之间。而中共土改中的杀人权是下放到区一级的。共产党的区长、书记、工作组组长、贫农会成员可以随意掌握地主、富农的生杀大权，也可以决定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贫雇农对谁不满，私下跟工作组说一下，就能借刀杀人。

杀人是按比例。

据中共1948年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00万个阶级敌人来。

作家铁流曾披露：“土改时，工作组组长就有权力批准逮人或杀人。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一批一批押出去毙了就是。20人为一批，犯人齐刷刷地跪在地上。

“被杀的人全打脑袋，子弹均是开花弹，一枪一个，真利索。死者虽属痛快，但半截脑壳不见了，有的还没有脑袋了，人变成了一个木樁樁。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现在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时，我执内勤，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片，白的脑花和红的血水流成一条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绿草，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真叫惨不忍睹。”

土改批斗运动中的很多酷刑超乎人类的想像，有学者称之为反人类酷刑。

仅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据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土地改革检查队的统计：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起来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丹徒县炭诸乡等3个乡斗争的40人中，有26人一上台就跪，被剥掉衣服，有10人被剥光了衣服；太仓县浮北乡斗争时按照跪、剥衣服、浇冷水、蹲水缸、上老虎凳的套路，连两个60岁左右的老太太也被迫蹲水缸。”

杀人是革命的需要，杀得多、杀得狠是革命的忠诚表现。中共和毛泽东搞土改的真实目的，并不是着眼于分田到户，而是出于中共新生政权的杀人立威与共产意识形态的斗争惯性。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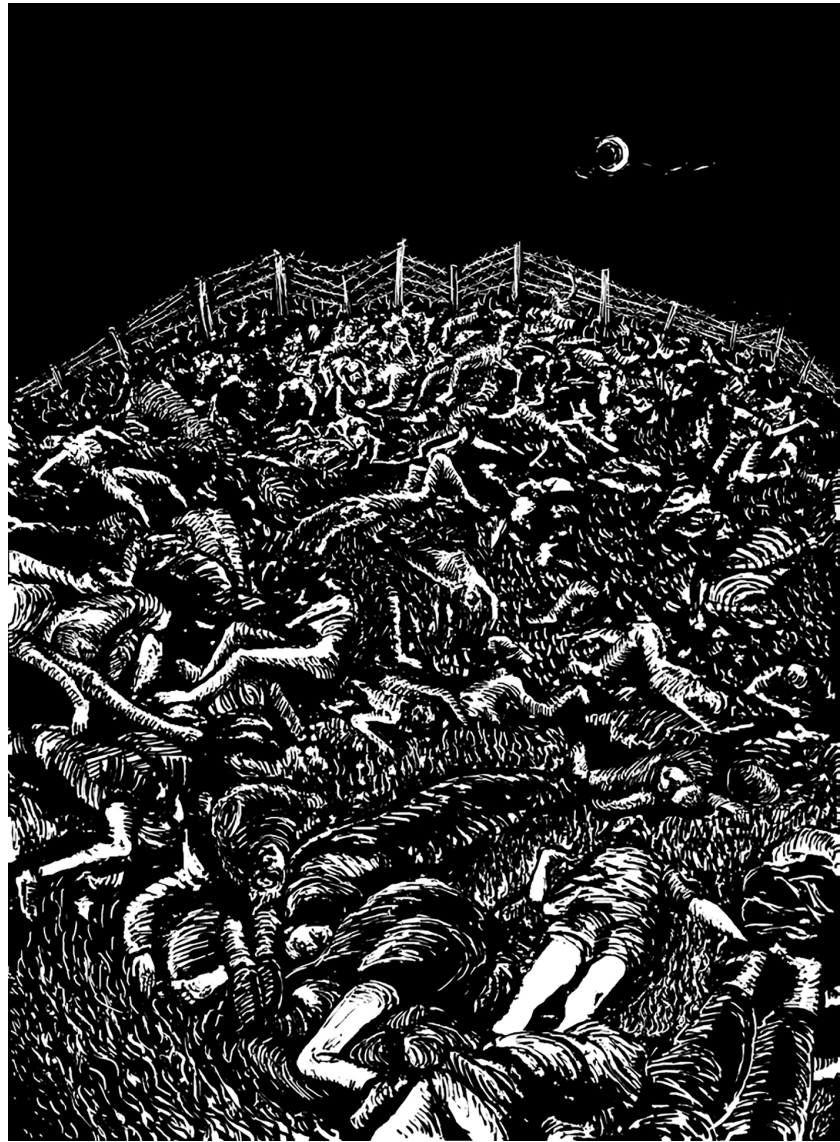
中共建政后的土改，把无法无天暴力剥夺他人财产与生命，包装成合法合理的“阶级斗争”、专政需要，在制造恐怖的同时，颠覆着善恶的道德标准，摧毁了文明基础，为以后经常性的政治动员下的群众斗争做了国家性演练。中共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一次次迫害运动之所以轻易上手，也是因为土改已为其种下了邪灵恐怖的基因与清除了传统道德后的正义缺失。

难以置信的 长春 围困战

作者 高天韵 大纪元 / 编辑 君健

在长春城的记忆里，有一段异常黑暗的历史。累累白骨之上，浮动着饥饿难耐的绝望。历史的凄惨，挥之不去，成为永远的噩梦。

《长春饿殍战》
插图 饿殍遍野
作者 巴丢草



2006年6月4日，吉林省《新文化报》刊登了一篇报导——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的工地发现大量骨骸：“（本报讯）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4天，怎么也有几千具！2日清晨，很多市民围在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的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

■ 饿殍之战

1948年3月13日，在中共军队攻占了四平后，长春成为中共军队包围下的一座孤岛。自5月23日起，中共军队切断了长春的空中运输，开始对长春进行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6月5日，林彪、罗荣桓、谭政联名下达《围困长春的办法》，要求断绝长春与外界的交通和一切商业关系，禁止粮食、柴草、蔬菜等生活物资流入长春，切断守

军的外援。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案，并要求“必须”断绝地面取得粮食的来源。

由于城中存粮只能维持到7月底，因此在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要求从8月1日起疏散民众。但是中共军队的做法却是“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原吉林省政府参议兼驻长春代表段克文曾撰文回忆说，有中共哨兵看到难民走近便说：“老乡，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再前进，我们只好开枪了。”难民哀求道：“我们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这儿把我们饿死呢？”哨兵回答：“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也不敢违背纪律。”有人不顾一切走上前去，“砰”一枪就一命呜呼了。段克文还提到，当时城里传闻，有一名共军的连长，因为看到不准放人的惨状，内心极度不安自杀身亡。

9月9日，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

正式开课，校长是范文澜。

鲁大明被分配到医学院，成为了中共第一批军医学员。当时的教学条件十分简陋，教师有苏联人，有从国统区归来和留苏回来的中国人，也有日本投降后留下来的高级军医，他们都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

在入学后的第二年，他们进入了军事医科学必须完成且很重要的人体解剖阶段。此时学校急求供教学用的专用死人，但是华北是一个土地贫瘠、生活落后的地方。钱财很缺的北方大学医学院，不能免费找到供学校上课解剖的死人尸体。即使有大把银元可用于收购尸体，华北人出于千年的民俗，也不愿把亲人的遗体当成商品一样随便卖给别人用来肢解。

不久，学校缺少尸体的困难，被中共边区长官杨秀峰等政要知道。很快，一车车国民党军队战俘运到了学校，一些人据说还参加过远征印度、缅甸，同日军打过许多恶仗。起初，鲁大明等学员和老师并不知道为何送国民党战俘到学校，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供学员们进行活体解剖用的。

让鲁大明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编号为甲014号的史连长。听到他半夜痛哭，鲁大明过去询问原因。其他战俘告诉他：“明天是我们28岁的生日。他已有12年没有回浙江江山老家了！他曾在缅北森林同日本军刺刀肉搏，鬼子的刀穿透肩

用国军战俘做医学解剖的北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



膀肉，骨头都露出了，血都飙了出来，他也没哭过。他是官派留意大利、学装甲的长官，他是个很传统很爱母亲的孝子……”而史连长告诉他，他梦见母亲跪在家乡的村门溪涧石桥上，哭喊着儿子的乳名在烧银色纸钱……

就是这样一个铮铮铁汉，却成为中共军医学员第一个解剖的对象。

在被拒绝枪毙后再行解剖后，史连长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身为一个革命军人，只杀过日本人。从未伤害过你们任何一个人。如果今后有人问我去了哪里，请你们不要告诉他们，我是在这里以这样方式死掉的，就说我是前线阵亡或失踪的。特别拜托：万万不要告诉我的老母。其次，别没收我身上挂着的那枚十字架，等你们干完活，准备埋葬前，把它塞进我的心脏与这堆无用的躯囊随便埋了吧！看在神的份上，打点吗啡吧！我会配合到最后一分钟！”

无需再引述那残忍的一幕……当一个月的活体生理解剖实验结束后，曾经生龙活虎的国民党战俘只剩下了残肢剩骨，而后这些残肢剩骨又被林子地的野狗、乌鸦吞食……那两年四乡的老百姓都在问：那片林子地的树怎么长得特别绿？各家的狗儿怎么肥得特别快？野狗的毛儿怎么长得特别油光？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阳光下的罪恶呢？

在披露这段史实的军医鲁大明忏悔之际，还有多少人亟待悔悟啊！

结语

这样的罪恶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继续延续着。1999年前，一般只有中共高官或有关系者才有机会在患病后换取器官，而在这些中共高官换取器官的背后，就是一条条无辜的生命，中共军警系统摘取器官有历史、有承传、有体系。1999年7月，江泽民掀起镇压法轮功的狂涛后，中共则开始了大规模的摘取、盗卖人体器官的罪恶，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这样的罪恶至今未休，这样的罪恶还要延续到何时呢？

走进真相



编者按：由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担任主席的国际独立“人民法庭”于2019年6月17日在伦敦判定中国（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已存在多年，并仍然存在，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

尼斯爵士是国际刑事犯罪领域的知名人士，1998年至2006年期间，他主导了国际刑事法庭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起诉。

2012年重庆市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亡美领馆后，将薄熙来、周永康等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证据交给美方。然而，中共活摘器官、活体解剖的罪恶并非始于1999年镇压法轮功后，早在国共内战期间以及建政后的若干年中，就已然存在。让我们将罪恶一一还原。

真相

关乎现在与未来

缅甸远征军史连长的红朝遭遇

作者 林辉 大纪元 / 编辑 晓慧

中共残忍对待国军战俘

国共内战期间，中共在苏联的帮助下，在“驱使平民当炮灰”等非人道的战术运用下，在埋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间谍的配合下，赢得了若干战役的胜利。中共1949年建政后，又开始了所谓的“剿匪”行动，即剿灭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力量。那么，中共是如何对待国民党战俘的呢？

据原中共国防部长秦基伟部某军官的回忆录透露，国民党“除了团、营一级的俘虏军官留下审讯，其它俘虏由连一级指挥员自行处置，先开始还吸收部分降兵入伍，后来后勤供应紧张，各连队都把俘虏分批次处理掉，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边、山边用刺刀捅死，用他们自己挖的坑埋掉。”

而更为残忍的是，一些国民党战俘的心肝被挖出，供共军将官下酒。该军官回忆录中描述的一个身高一米八的张姓连长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他自己也被欺骗吃了人肝。当他从好友口中得知自己吃的是人肝时，不禁吐了一天一夜。这样畜生都不如的中共军官不知还有多少呢！

国军战俘被活体解剖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不少国民党战俘还成为了中共医学院学生活体解剖的对象。一位化名鲁大明的中共著名军医在晚年将这段尘封的往事吐露了出来。

鲁大明是山东人，1937年入伍。抗战胜利后，他考取了中共建政前的第一所正规综合大学——北方大学。当时的北方大学在河北邢台市西关，是后来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1946年5月，该校

联名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以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饥民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涌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饥民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10月20日，郑洞国率领的长春守军全部放下武器，中共夺取了长春，代价是10多万平民的惨死。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说：“据最低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6月末到10月初，4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15万具。”时任长春市民政厅长兼市长尚传道在回忆录中提到，围城期间，长春市民因饿、病而死的共达12万人。

国民政府方面认为，中共军队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共产党应为这一问题负责。

人间地狱

当年守卫长春的郑洞国回忆说：“7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

1948年洪熙街卡子内饿死者尸体最多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露天厕所所在地。



剧……长春本是个美丽的城市，此时却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劫后余生的人后来回忆在“卡空”里的日子说：“吃的是草和树叶，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

国军新一军重炮营少尉指导员胡长庚在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的情景。7月1日，他写到：“苗太太说她和她母亲、孩子这次走路没走成回来，可受罪可苦啦！八路横说竖说就是一个不放。你给他们跪下，他们也跪下，他们是上面的命令，不敢违背，请原谅！……不放走求生路的老百姓，要活活饿死他们吗？……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段克文在《战犯回忆》说，一天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蜂拥抢购。段克文带人去查看，卖的竟然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去毙了。但杀了一个杀不了俩，人吃人还在蔓延。段克文提到，有人将小孩诱进屋里，一棒打死，然后斩头、剥皮，大卸八块，煮了自己吃，日子久了，甚至做起人肉生意来。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中共独八师一团参谋长，他回忆道：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通信员和团长吴子玉进去看时，锅里还剩条大腿。

宋占林（退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回忆说：“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

1948年10月15日，《西京日报》报导了长春难民的凄惨情形：“（本报沈阳一日航讯）据由长春逃沈者谈：长春正如浪花冲击之孤岛，坚持屹立。自5月24日残共与蒙古、朝鲜，联合武力在长春周围加强围攻，机场失守，飞机不能降落，市内米价遂告上升。民众只有找野草、瓜花、豆秧、树皮来充饥，一边卖去箱底，换取米粮、豆饼、酒糟一类的东西配合吞食。糟糠豆粕、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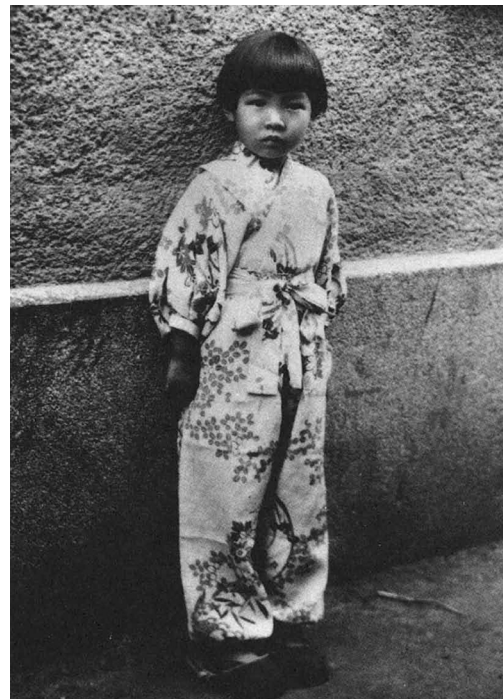
皮之类，原非人食，食之不仅有碍营养，且患消化器病，以致普遍性眼疾与胃肠炎，广泛发生，身体日渐瘦弱，蓬发污面，终至相继倒毙僻巷颓垣，陋室沟壑之间。长春人正在如此扮演着空前未有的惨剧中的主角。”

■ 《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

日本妇女远藤誉，婚前姓大久保，1941年出生在长春，7岁时亲历围城，哥哥和弟弟都活活地饿死。之后，她见证了中共夺权后最初几年的政治运动的疯狂。1953年，远藤与家人返回日本。然而，童年的阴影，让她刻骨铭心。1984年，远藤在日本出版了《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回顾了长春围城的苦难，引起国际关注。2014年，此书中文版由台湾乐果文化出版社出版。2016年8月，其著作英文版在美国问世。

1948年围城期间，中共军队用双重铁丝网将长春城围起。“卡子”是用铁丝网钉在木桩上的木栅栏，同时指被两层铁丝网圈住的地带。当时，许多想要寻找活路的长春百姓，因为共军不准离开，就陷在“卡子”区域，倒毙在地。在“卡子”里，尸骨成堆。

2016年8月，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远藤誉。报导中引述远藤的回忆说：当年，“饥饿令全家



童年时代的远藤誉

从吃酿高粱酒剩的酒糟开始，到吃野菜、榆树叶和树皮，街头上到处可见饿死的尸体和撕吃尸体的狗”。

“1948年9月20日大久保领着最后留在长春的约90名日本人步行抵达‘卡子’——共军围城的双重铁丝网之间区域。一行人穿过腐尸、干尸遍地的难民地带，摸黑找到一块尸体较少的地方睡下，次日醒来发现睡在尸骨上，身边就有伸出地面的死人手臂。一望无际的尸体和难民，近处有啃人骨的成人、把血当奶舔的婴儿……”

《卡子》在上世纪90年代被译成中文，可是，这本书却不能在中国出版。远藤誉说：“中国于我有养育之恩，我怀着无以名状的悲痛，想播撒真相的种子来建造纪念卡子的墓碑，为牺牲者们镇魂。中国人民也有权了解那段历史真相并记取教训。”

■ 恐怖的余波

1989年，大陆报告文学作家张正隆出版了描写长春围困战的《雪白血红》。该书涉及强制动员参军、围城饿死大量平民等事实，发行后引起轰动，热卖10万册。可是很快，此书被禁，责任编辑马成翼被关押了23天，张正隆被关押了一个月。

张戎夫妇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引述中共大将粟裕的话说，利用饿死平民百姓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此后在“若干城市采用”。

在《长春饿殍战》中，作者杜斌写道：“一名76岁的长春籍老兵王钧儒（译音），曾经是参与困饿长春的10万军人之一，他现在悔恨当初追随中共将数十万难民饿毙。关于共军为何要将难民们饿毙的问题，他这样告诉《纽约时报》说：‘我们得到军令是，他们（难民）是敌人，他们必须死。’”

长春的夕阳，令远藤誉一生难忘。与金色的余晖一道嵌入记忆的，是无辜死去的生命和撕扯人心的哀号。中共的存在，是中国的劫难。 ☐



呆了：“只见路边自行车道与马路结合处，方圆7米左右的地方，在被撞倒的数排自行车上面，是一大片血肉模糊的尸体。所有尸身连成一片，呈饼状，约有十多具，上面还有坦克履带印。一个小家伙脑袋被压扁，白色的脑浆迸出数米远；另一个戴眼镜的男学生，仰天躺着，下面的自行车车把竟从他的后背穿入，从腹部穿出；还有一个女的，压得只剩下依稀可辨的蓝色裙子……”“我从未目睹过这样残忍的场面（即便在电影中）。”

英国解密文件：“六四”杀人逾万

六四屠杀中究竟死了多少人？

“六四”刚刚过去的新闻发布会上，张工代表戒严部队和中共政府说：“6月4日凌晨4:30至5:30，戒严部队在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据《六四档案》记载：中国红十字会人员6月4日发布的消息称，死2700人，伤30000人；美国总统首席助理6月9日发布的消息称，死逾4000人。

据《六四档案》从《联合报》得到的消息称，法新社北约情报人员6月9日称，死难人数可能

多达7000人。

2017年10月20日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封了1989年的六四外交档案，这份解密电报是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艾伦·唐纳德在“六四”的第二天发给英国政府的。电报披露：“那夜的平民死亡人数少说也有一万。”

电报引述了来自一名中共国务院成员的消息，据说这个人现在仍在中共国务院里，所以还不能公开他的身份。

电报还披露了骇人听闻的细节：用推土机把这些残骸铲起来，焚烧后冲入下水道。有四名受伤的女大学生，向那些杀人的士兵哀求让她们活命，但仍被士兵用刺刀捅死。

早前美国白宫披露的机密档案也提供了相同的数据：美国从中方戒严部队线人那里得到报告，说中共的内部文件提到，在天安门及长安街，有8726人被杀，在其它地区有1728人被杀，两者加在一起是10454人，受伤的人数是28796人。

《中国“六四”真相》作者张良写道：“据北京市公安局调查了解‘死亡’人员中，有大学教师、科技人员、机关干部、工人、个体户，还有退休职工、中学生甚至于小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9岁。” ☐



人，穿过喉咙，打掉一颗牙齿，又从嘴里穿出。

南池子：“杀人象打鸟一样”

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南池子就有40多人中弹倒下，他们中有50多岁的妇人，也有七八岁的男孩。这些基本上是北京市民，其中有不少妇女儿童，有的还穿着拖鞋拿着扇子，显然是南池子附近的居民。

退伍侦察兵写道：“我头一次看到杀人象打鸟一样”，“一个尉级军官拿54手枪，左手扣右手为依托，对南池子躲在垃圾桶后的一个个平民开枪，喊几句口号打几枪……一响一个平民倒地。”“一个老人骑自行车说要上班，边说边掏工作证，还没等他掏出，当胸一枪撂倒，连车带人就那么给撂了。”

一位报社记者证实，那天凌晨，他曾躲在公安部附近街边的垃圾桶后，见一青年走向军人，敞开衣襟朝军人说：“畜牲，朝这儿打！”被当场击毙。

协和医院的停尸房：冰柜柜门已无法关闭

据协和医大一位在读博士生回忆，她曾协助将死尸抬送到协和医院的停尸房，但冰柜已经人

满为患，柜门无法关闭。

事后，北大医院一位50多岁的医生说，协和医院内的遇难者遗体已“有100多具”。天安门金水桥前、天安门广场旗杆一带和历史博物馆前都有急救车无法带走的尸体。

六部口坦克车碾人惨案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位受伤者著文留证：大约在6月4日清晨7:00左右，正当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从新华北街转向西长安街的时候，“突然有人惊呼：‘坦克来了！坦克来了！’我扭头一看，只见三辆重型坦克并排行驶，从学生队伍后面快速地冲过来。随即又听到一阵‘砰砰’的响声……让人感觉到呼吸困难，这是坦克在向学队伍发射毒气弹……”

“同学们情急之下纷纷向路边躲避，准备给坦克让出一条通道。但是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着一道高逾一米的铁栏栅，这道铁栏栅又是尖头的，一时无法翻越过去，同学们只好挤在铁栏栅旁……正当同学们在铁栏栅旁挤成一团时，其中一辆坦克已经直接开进铁栏栅旁的人群中，顿时响起一阵惊恐而凄厉的叫喊声。”

锤罗白来到六部口时，当即被眼前的惨象惊



换上国民党军队服装的“志愿军”战俘

1.4万中共“志愿军”战俘拒回大陆

作者 林辉 大纪元 / 编辑 君健

2.1万“志愿军”战俘，却有1.4万名以“毋宁死”的坚决态度拒绝返回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选择去了台湾。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共派兵帮助朝鲜侵略韩国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将中共军队打回了“三八”线。此后，双方在“三八”线地区呈对峙局面。最终双方同意谈判。

中共大部分战俘不愿被遣返

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中共和美国发生了冲突。中共要求遣返所有被俘虏的“志愿军”战俘，但美国方面则根据自愿原则遣返。

许多中共军人寻找机会自愿投降联合国军，而且比例相当大。当时联合国军俘获的中共军人有2.1万余人，其中14325人以“毋宁死”的坚决态度拒绝返回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

联合国军的文件中有整列火车的中共战俘在没有任何士兵押送的情况下从前线一路送到大邱的记录，途中无一人逃跑。

有资料表明这些中共战俘以受降或者接受改编的前国民党军队官兵为主。他们不愿被遣返的原因主要是中共在军队中通过摧毁人的尊严而实行的种种洗脑等严酷政策，他们担心回国后会受到不公待遇。

中共威逼色诱战俘

仅有三分之一的战俘愿意回国大大出乎中共的预料。颜面顿失的中共遂指责这是联合国军强

第20000名“志愿军”战俘微笑着走进联军的战俘营





“志愿军”战俘乘坐火车去海港转船赴台



台湾民众夹道欢迎“志愿军”战俘



迫战俘去台湾。依照停战协定，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必须转移到中立国营区再度由中共派出代表进行“解释”，时间为90天。

中共方面坚持实行对战俘一对一的“解释”。据各国记者统计，单个解释的时间最短的为75分钟，最长的达到153分钟。在解释期间，中共解释代表与战俘反复答问“你要去哪里”这同一个问题，甚至使用“台湾很快要解放”、“蒋帮就要完蛋”等违反解释规则的威胁性用语。有解释代表甚至说出了“台湾已经解放”这样的笑话。

为了促使战俘回国，中共解释代表甚至携带漂亮女子前往帐篷，每接见一个战俘，女子便说“只要你回国，愿意和你组成家庭”。

按照规定，解释完毕后，战俘要从两扇门中选择一个离开帐篷。中遣会主席印度代表以英语说明哪扇门对应遣返，但中方翻译则将“遣返”翻译成“愿意回去的”。有战俘不解“回去”二字究竟指回国还是回济州岛，大吼请求解释，而中共解释代表则要求印度主席禁止解释，若有联合国观察员解释，则被印度主席逐出帐篷。

90天解释期过后，仅有440名战俘回心转意，占总人数的3%。

“123 自由日”

为了确保把1万多名战俘顺利送到台湾，美国陆军部长史蒂文斯和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分别抵达韩国。双方密切协调，敲定每一个细节。

1954年1月20日上午9时，第一批前“志愿军”战俘高举中华民国国旗，率先抵达飘扬着联合国、中华民国、韩国和美国国旗的自由门。前往台湾的登船地点是仁川。美军在距仁川10公里的艾斯康城（Ascom City，美军后勤补给重镇）设立“自由之门”。

1月20日下午，1.4万多名前“志愿军”战俘开始陆续抵达仁川，分三批登上15艘舰船，于21日上午在美军飞机和舰艇的护送下浩浩荡荡驶向台湾。

1月23日，1.4万多名战俘被移交给中华民国，获得自由，蒋介石总统同日发表欢迎辞。因此这一天被称为“123自由日”。

最后回中国的“志愿军”战俘，在历次运动中，不少人受到牵连，被批斗，遭受各种审判、迫害，人生惨淡。而去台湾的1.4万多名战俘，最终还能衣锦还乡，被当作台胞热情款待。 天

26人死亡……

学生锺罗白回忆到：“每隔三五米，就有一滩血，有的血很厚。”“惊魂不定的人们，又重新集聚起来，高呼‘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审判你们！’枪声又响了，人们开始重新卧倒，又重新救护倒下的受伤者，后面的人又重新走在前面。就这样，每行进10米，需要5分钟，这5分钟内，至少要倒下四五个人。”

复兴门：士兵持枪追杀民众；急诊室的血没了脚脖子

部队开到复兴门。燕京饭店附近，没有人用砖头石子袭击军人，没有人喊口号，但军人只要发现有人看他们，立刻无情地开火。

家居木樨地的陈晖叙述：他在燕京饭店附近街口，见一士兵持枪追杀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女孩），直追至女孩钻进一铁桌底，打死为止。

据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报道，儿童医院很快就被送来的伤员塞满了，急诊室的血没了脚脖子。仅仅300-400米的范围，送来的伤员达200-300人，死亡者达20多人。

开始医务人员还对伤员逐一进行登记，但到12:00，电台播出中共《告全国人民书》，他们立

即意识到，反革命暴乱的定性将使所有受伤者受到迫害，马上决定将名单撕掉。

西单：不断有人倒下，但活着的人依然前行

西单是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位退伍侦察兵写道：“枪声依然在响，人群却直直地、一排一排地靠近军车，又一个一个地倒下。”枪声突然停下来，也许这些战士被惊骇住了，他们直楞楞地看着这些不畏死的人们一步步逼近……“突然，一个军官喊了声：‘开枪啊！’十几个战士，一齐抬高了枪口直接向人群射击。枪声、哭声、人们的尖叫声、痛苦的嚎叫声，乱成一团。一个高高胖胖的小伙子，大喊着‘操你妈！’甩出了一块砖头，并直接冲向军车，没跑几步，就扑倒在地上。”

锺罗白回忆道：手持大棒的武警迫使一群人涌进石碑胡同，胡同因临时施工封死了。这时，胡同口一阵枪声和惨叫声响起，当屠杀者远去，已倒下十几个人，其中至少5个人死亡。

据时任总参装备部大校、罗瑞卿之子罗宇回忆：当时部队行进受到群众阻拦，底下请示怎么办时，“上头”确有人说：“你们手上的家伙是烧火杆啊？”

4:30 清场开始，广场上发生了什么？

凌晨4:00，广场上的照明灯突然一齐熄灭，这是清场开始的一个统一信号。4:30清场开始。武警在前，步兵居中，装甲车在后，由北向南缓缓推进。执行清场的是山西第27军。

广场纠察队长张健中弹，右腿肱骨粉碎性骨折。从纪念碑的西南传来阵阵枪声。一位香港学生联合会的成员，看到他身边一位北师大学生“满头是血，几乎整个头被炸开”，当时就死了。一位波兰国家电视台记者，看到士兵在没受到挑衅的情况下，随意向奔逃学生的背后开枪。台湾《中国时报》副主笔兼国外巡回特派员徐宗懋，在清晨6点左右于广场东南角被击中，子弹从后颈打

“六四”大屠杀实录

根据陈小雅《八九民运史》改编 大纪元
编辑 章华

“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30年了，在今日的大陆，公开谈论它和纪念遇难者仍受到严禁。本文仅攫取了几个真相片段，中共的残暴嗜血本性便一目了然。

“六四”大屠杀的起因

1989年4月15日，主张改革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北京高校大学生与市民的悼念，活动很快转向针对通货膨胀、就业困难、官员贪腐、没有新闻自由等问题。参加人数越来越多，从大学生扩展到中学生、工人、市民等社会各界，游行队伍最长达100多万人。

由于中共高层拒绝与学生对话，5月中旬，学生的请愿上升为绝食静坐，全国各地40多个大中城市响应。

中共高层定性“反革命暴乱”，战前动员煽动仇恨

1989年6月3日下午4:00在勤政殿，中共召集戒严紧急会议，定性北京已发生“反革命暴乱”。决定当晚戒严部队从北京各方向向天安门进发，与已隐蔽在天安门四周的戒严部队会合，对天安门广场清场。部队开进途中，如遇阻拦，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士兵在清场前10日内已不准看新闻。战前动员煽动对学生和市民的仇恨。38军担任主攻的一个团，战前动员场面十分“火爆”：军官高声喝问：“敢不敢打？”“敢打！”“怎么打？”“往



死里打！”数十辆军车满载荷枪实弹的官兵，杀气腾腾地开出总后大院。

木樨地：“他们开枪了！”

血幕从军事博物馆正式拉开。武警用砖头、带有金属扣的皮带、大棒殴打群众。部队向人群释放催泪弹。

晚上11:00整，木樨地，枪声突然响起。几位北航的学生目睹到：“北京大学的李平上走到士兵和平民之间的空地上准备与士兵对话，一排子弹打来击中了他。他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倒下了。”他被击中头部，因大量失血很快死亡。

复兴医院平均每分钟都有自行车或三轮车送来一位伤员。在急诊室里横七竖八的全是伤者和死者。很多伤员因为抢救不及时而死亡。家住木樨地北里的王庆元回忆：“一位中年男子，体壮如牛，工人模样，左臂有一枪伤，仅一筷子大小的小洞，血流如注，但其面无惧色，任其流淌一地……他一脸豪气地说：‘没事儿，这仇迟早要报’。大约仅半个钟头，我再次经过这里时，看见过道边伏尸一具，仔细端详确已没气，左臂上如筷子大小的洞还在，此人正是刚才那位一脸豪气的男子。”

截止6月4日凌晨2:45，仅复兴医院就有

“右派死亡集中营”——夹边沟

作者 石元裕、陈峰、高天韵等 大纪元 / 编辑 章华

夹边沟，位于甘肃省祁连山下的荒漠戈壁之中。这里夏天酷热，最高可达50摄氏度，冬天奇寒，最低将近零下30度。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全年几乎无降水。根本不宜人居住。

1957年反右运动中，甘肃省共揪出右派12000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3000人。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他们被集中关押在夹边沟农场。

这里只能接收500人，根本无法使3000人果腹。然而，从甘肃省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中共对右派的改造与惩罚，至于他们能不能活下来，并没有人关心。

适逢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大多数被关押者因饥饿而死亡，称之为“夹边沟惨案”。

来的不是一般人

来到这里的都不是一般人：大学毕业的很多，还有长征干部、专业人士、兰州大学校长等。

画家、诗人高尔泰在回忆录中写道：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等。画家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诸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进门时就被没收了。没被没收的，持有者死后都成了难友生火取暖的材料。

吃饱肚子已是奢求，遑论精神生活。看书还有啥用？右派带

来的书都擦屁股或者卷烟了。

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

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1958年以后，降为每月26斤，20斤，最少时降到15斤，每天不足7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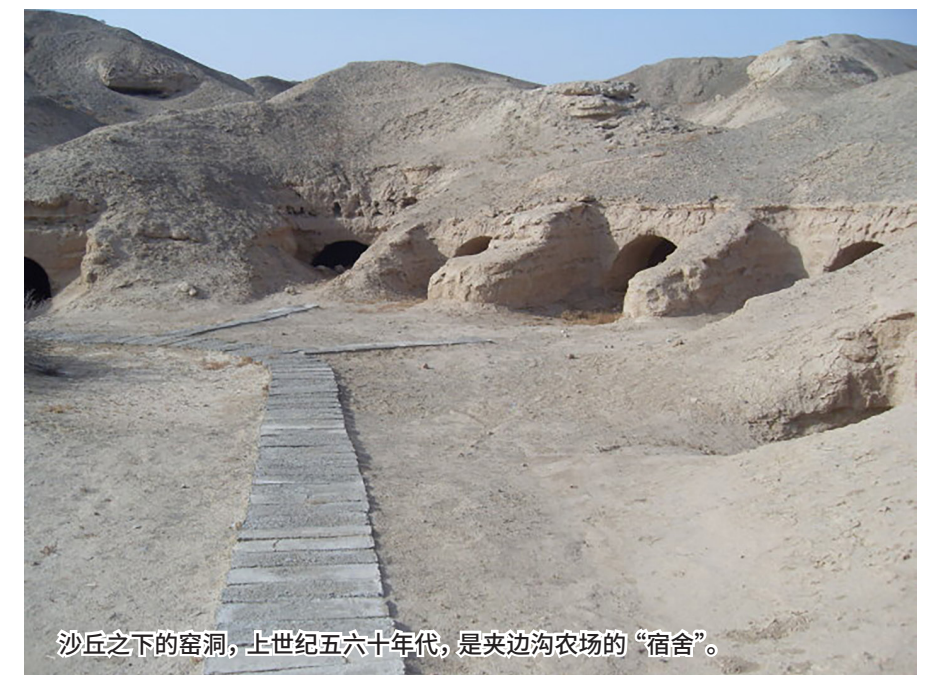
1960年春播时，有一半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食堂供应的是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老右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保存热量，等待下顿糊糊汤到来。

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死神面前，人们开始本能

地挣扎求生。

还有点力气的，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到草滩上挖鼠洞，鼠口夺粮。看到蜥蜴，抓住烧煮而食，有人因此中毒而亡。草籽吃得太多，无法排便，肚子鼓得象皮球，有人最后活活被臌胀死了。

1960年4月，兰州中医医院的右派高吉义等9人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有160斤，一口气统统吃光，吃得“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



沙丘之下的窑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夹边沟农场的“宿舍”。

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个人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挑拣洋芋疙瘩吃！

一名右派，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喝了开水，到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喊叫了一夜，终于在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农场在他的尸体边召开现场批判大会，管教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死者的妻子在现场，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傅作义的堂弟雪葬夹边沟

傅作恭是国民党叛将傅作义的堂弟，留美博士、水利专家。中共建政后，傅作义写信叫弟弟回来为国效力。傅作恭放弃美国的优越条件和前程，欣然从命，还加入了中共。

傅作恭任甘肃省水利厅总工程师，因认为甘肃省上马引洮工程尚不具备条件，被甘肃省委定性为阶级敌人向党进攻，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

年过半百的他每天饥饿难耐，体力不支，于是向傅作义写信求援。傅作义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在回信中对他批评教育一番。

1960年冬季的一天，傅作恭实在饿得不行，想去抠点猪食充饥，结果倒在农场场部的猪圈旁，再也没有起来。大雪覆盖了他的

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活人吃死人

1960年9月，夹边沟的右派被迁往明水农场。那里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没有粮食，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右派们象原始人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山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当场部请求调点粮时，张掖地委书记训斥道：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死亡的人太多，已来不及掩埋，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用沙子盖一下了事。被形象地称为“钻沙包”。

由于对死难者的掩埋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

这时候，最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死者的遗体被饿得发狂的人们从沙地里扒出来，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全身没有一点肉和脂肪，于是，他们的胸腔被划开，开肠破肚，内脏被取出。

有些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也有悄悄焙干了存着慢慢吃的。许多人就是靠吃饿死的难友才活下来。

留美博士的尊严

董坚毅，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1952年回国，任泌尿科主

任。1957年，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被划为右派。1960年11月上旬的一天，董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珍视尊严的他向组长刘文汉交待，如何用衣被和毛毯包裹他的尸体。三天后去世，年仅35岁。刘文汉将他包扎掩埋。七八天后，董的妻子顾晓颖千里迢迢从上海前来探望，却被告知丈夫已死。

当难友带她去看丈夫的尸体时，却发现尸体被抛在荒野，裹尸的毛毯、鸭绒已被扒去，尸体上的肉被切割吃完，只剩下紫色的头颅留在骨架上。难友们找来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让顾晓颖带回上海。

尾声

1960年冬季，中央监察部长钱瑛到张掖视察灾情时，途中无意发现荒野沟壑中堆积着数百具无人掩埋的饿殍尸体，才抢救了最后的幸存者。

短短三年间，3000名右派只剩下300人。1961年1月，他们才陆续遣返原籍。

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2000余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实际上，他们绝大多数死于饥饿，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后来，右派们的遗骨被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再后来，盐碱地种上了一片片红红的辣椒，很难看出60年前在这里曾发生过人间惨剧，只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文革时的屠杀

肚子很大，他就拿那个尖头在肚子上一划，肚子就崩开了。这不算典型案例。

记者：什么是典型案例？

谭合成：钟佩英一家三口被杀是典型案例，因为它是道县开始屠杀的导火索。大规模杀人就是从他们杨家公社开始的。

第一个被杀的叫朱勉，他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当过乡长干事，1964年被定为所谓的“四类分子”。

朱勉是被寿雁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授意要“搞掉”的。寿雁公社干部反复讨论后，最终在8月13日晚让几个民兵将朱勉拉到山上打死，抛尸水塘。

钟佩英也是四类分子，被安上“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

拖到山上用锄头扁担打死。因为怕她两个儿子报复，随后将18岁和20岁的两名少年也杀死。上面鼓励杀得好，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钟佩英所在的杨家公社的几个大队赶紧行动，先后杀了31个人。自此，杀人风很快开始蔓延。

道县大屠杀是模板

记者：杀人时伴随着强奸、轮奸吗？

谭合成：道县杀人，强奸、轮奸是普遍行为，这跟当年土改是一脉相传的，土改也是这么干的，搞地主老婆。有好多女的后来都不承认，因为活下来的人，现在都儿孙满堂，说自己当年被人轮奸，而轮奸她的人还逍遥法外、耀武扬威，她也不好说。我那里

面有四十多个例子，实际上数字远远比这个更多，轮奸不杀人、强奸不杀人不立案的，不追究责任。

记者：就不追究责任了？

谭合成：因为他追究不过来，追究责任的只有几种人：一种是在公社一级范围内，为首策划、组织、实施杀人的；一种是乡一级别的，一个村子为首的不算，在乡范围为首的就追究责任；第三种是谋财害命，挟嫌报复的这个追究。

挟嫌报复的案例，有一家九口被灭门了，是典型案例，因为那是贫下中农。一家九口：父母、老婆、儿子、儿女、还有老婆肚里的孩子，全部被杀光。因为他爸爸在“四清”的时候，带头整治了“四不清”干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要找个借口，把他给杀了，一家九口全被杀光，这是挟嫌报复。

其它的案例，因为太多了，参与杀人的人有15000多人。道县一个县杀了4000多人，其中只有400多个案例是立案审查的，其它是不立案的。

记者：道县屠杀之后，还有哪些运动跟这个类似？

谭合成：每一个运动都是这个模板。历次运动深受其害的都是下层人民。

我打个比方说，被杀的这些四类分子，他们可不可怜？杀人的人，可不可怜？杀人的人也很可怜，所以我特别同意杨继绳先生说的——政治愚民杀政治贱民，他说的一点不错，说到问题的本质，就是一个体制。

杀的9000多人,没有一个有过错,没有一个人在思想上或行为上是“反革命”的。道县杀人的主要理论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当时道县很多领导要求下面的干部,正确对待杀人的问题,要大家学习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很多不是心地特别歹毒的那种人都参与了杀人,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党员参加了杀人,百分之六十几的基层干部参加了杀人。我说的参加了杀人都是直接的,就是手上有血的。

道县基本上99%的地区和大队、公社都杀了人。另外,凡是没有参与杀人的这些基层组织的书记、干部,后来日子都不好过。这从反面证明,至少9000个以上的人和派性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原来是共产党忠实信徒,如果不参加这样一次调查,我们不会醒悟,也不会发生我所说的世界观、人生观根本性的颠覆。

只有在中共领导下才出现的事情

记者:道县大屠杀与其它杀人有何区别?

谭合成:象湖南道县这样的杀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出现的事情。文革有三种杀人的方法:一种是判“反革命罪”被枪毙的,大概十几万人;一种是派系武斗死的。但是这两种死的方式,人数加起来还没有(第三种方法)屠杀四类分子和其子女的多。

道县屠杀方式在1966年到1968年的中国大陆是非常普遍的。



武装民兵看押“四类分子”

这些人(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已经到了“人曰可杀”的地步,成为政治贱民,没有理由就被拉出去杀了,杀遍全中国,因为它象流行病一样,消息传到哪,哪就开始杀。比如说我一天可以走60里地,今天在这杀,一天以后60里地之内就在杀,两天就120里地内杀……

一个大队因为都是一个宗族的,所以杀不下手。公社特别生气,公社姓廖的武装部长带了一个民兵排到他们那去,督促他们杀人,他去了就把12个四类分子和子女都抓起来,用绳子捆在一起,中间设一个炸药,一炸血肉横飞。

惨无人道的杀人方法

记者:杀人方法非常残忍?

谭合成:他们杀人没有不残忍的,晚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的一个后代子孙,被吊在树上,挖破了肚皮,嚎叫整整一个晚上,只求速死,最后血流疼死的。

道县保守派组织曾经把两吨多的炸药分发到下面的民兵组织手上,他们把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人在道县是比较普遍的,炸了以后血肉横飞,非常“壮观”,所以他们取个名字叫“仙女散花”。

记者:唐水兰在临盆时被杀?

谭合成:她本不是四类分子,嫁到“地富”家了,也是四类分子,逃回娘家也不行,要斩草除根,就派民兵把她从娘家抓回来。路上她挺着大肚子走不动,天又快黑了,(民兵)用一根二尺长的钢条,一端磨尖,就捅了她,拔出来以后还没死,女的快临盆了

大饥荒期间,鲜为人知的中共高层“特供”

作者 谢天奇 大纪元 / 编辑 译竹

中共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直接导致后续三年的全国空前大饥荒,3600万民众死于饥饿与疾病。而在此期间的1961年11月,中共中央特发文件要求高级干部享受“特需供应”,自此“特供”一词神秘诞生。

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所编《平凡与伟大——毛泽东中南海遗物轶事》中的一份图文资料显示,1961年7月,毛泽东一个月的伙食费是654.82元,另有水果费86.65元等。而当时寻常百姓伙食费平均一个月13-14元。毛的伙食费,相当于46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当年,全国正是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凄惨时期。

不是天灾是人祸

中共始称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三年困难时期”。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其《墓碑》一书中披露,三年期间风调雨顺,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完全是人祸。

中共大跃进“放卫星”吹出来的高产量,带来了高征收,农民上交的粮食远不够政府虚报的数目。中共又发动反瞒产私分运动,喊出:“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宁叫人头落地,不叫粮食短斤少两”的革命口号。各地组织二流子成立“万人整社团”,冲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挖地三尺,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都不放过。



大饥荒时老百姓吃“观音土”

后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

“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

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回忆说:“59年底至61年……天府之国的四川就饿死了1000万人”。尸体填满沟壑,活着的人无力抬尸体,死人搁在家中无人过问,臭气冲天,最后烂得只剩下骨架。

中共高官特供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转发时将“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几个字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需供应”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妒羡的词语,简称“特供”。

报告将特供分为三类:副委员长、副总理级: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人大、政协、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级:每人每



“特供”——中华白壳香烟（网络图片）



韶山滴水洞别墅一号楼

湖南道县文革纪事

作者 周慧心、常春 大纪元 / 编辑 译竹

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叶剑英曾在内部会议中透露，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邓小平曾向外国记者承认：“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鸡蛋3斤；国务院各部委正、副司局长级：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两条，鸡蛋2斤。

后各地参照中央执行特供标准，各地出现了特供商店，一般百姓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1960年10月7日，邯郸市轻工业局干部石旭东向中央写信反映称：“上级号召不吃肉以后，我们就一点也不吃了，可是特需供应的肉比我们过去大家吃的肉还要多。”

毛泽东的奢靡生活

荷兰历史学家冯克在其著作《毛的大饥荒》中提到，毛泽东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缴粮食。当有人担心饿死人的时候，毛说了如下魔鬼言论：“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以漠视他人生命为快的毛党魁，三年大饥荒期间，自己却过着荒淫奢华的生活。

大饥荒年代，毛突然对西餐有了兴趣，汪东兴担任顾问的韶山纪念馆所编的《毛泽东遗物事典》中，存有一份1961年4月厨师为毛泽东制定的西餐菜谱，其

中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肌、炸猪排、熘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牛、羊肉西餐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西餐菜谱仅鸡类就有一般人闻所未闻的名称：黄油鸡卷、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毛是否全部吃过这些高级菜肴，无从得知，但从菜单看，需要充足的原料、配料，在物质奇缺的60年代，可谓“特中之特”。

全国兴建毛及高官行宫

1959年，正当全国百姓活活饿死、哀鸿遍野时，各省、市为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大造豪华行宫别墅。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汪庄宾馆”和上海的“西郊宾馆”等等，装修标准竟与北京钓鱼台宾馆不相上下。

“滴水洞”，代号“二零三工程”，位于湖南韶山，原住农民全部迁出，整个工程参照毛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样，采用苏联建筑方案，修建了含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的庞大建筑群，历时两年，1962年竣工。在建设期间，正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时候。韶山原东郊公社（后改为龙洞公社），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个大队死亡707人，占总人口的13.5%。陈赓公社的楠香和石匠两个大队死亡率都在20%左右。全县约死3万人。

有计划的屠杀手段

大饥荒时期，中共不仅拒绝外国援助，反而大量输出粮食、对外援助。援外金额远超过了对苏还债，其中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总额为35.5亿元。1959与1960年净出口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1年的口粮。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难怪有学者称，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之一。 天

《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的作者谭合成曾是《芙蓉》杂志的编辑，机缘巧合他接触到大量官方资料，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

该书的英文版记载，湖南零陵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零陵地区（1995年改称永州市）11个县（含道县）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者15050人。

其中被“诛九族”灭门的有117户，被杀者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书中记载了十多种匪夷所思的杀人方式，杀人者不满足于把人处死，而是变换花样，享受处死过程的快感和折磨的乐趣。杀人的同时还伴随着抄没财产、强奸妻女等暴行。

在道县大屠杀中，15050人直接参与了杀戮，包括该县一半的干部和党员。但只有54人因为他们的罪行而被判刑，另有948名党员受到纪律处分。此外，每一个被杀的人，家属只收到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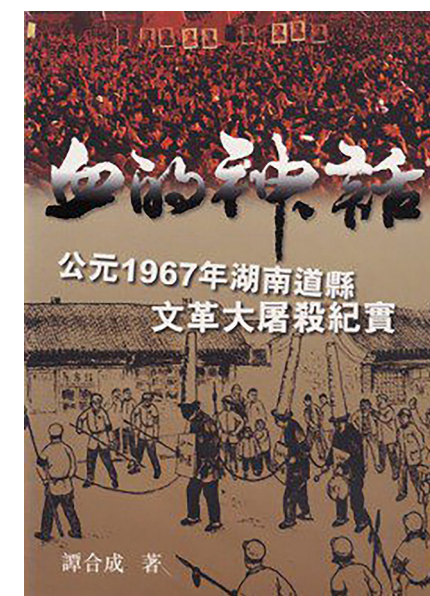
元人民币。

大纪元记者对谭合成先生进行了专访，他介绍了当时调查的起因、过程及其心里的变化（限篇幅原因，文有删略）。

党性杀人颠覆世界观

记者：为什么你说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了颠覆性的震撼？

谭合成：我去的时候，本来准备写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就是拨乱反正做得好的典型。但到那后发现“颂歌”没办法写，我不愿意说假话，出卖良心。



当时提到了三个85%：85%以上的遗属（被杀者幸存下来的家属）感到满意；85%的罪犯认罪、伏罪、认错；85%的干部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法治认识。但事实却是：杀人的人几乎没有认错的，被杀人的家属都战战兢兢，害怕再次被杀。

记者：你书中写道，一个杀人凶手在接受调查，回答为什么要杀人时，对工作组负责人说：“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

谭合成：当时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阶级斗争的思想就是要“赶尽杀绝黑七类，永保江山万代红”，没有理由，反正要杀。有很多人连鸡都不敢杀，他可以杀人，因为他认为自己杀的不是人，是阶级敌人。

记者：为什么你认为这不是派性杀人？

谭合成：这不是派性杀人，是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动员贫下中农的一次，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有计划地、灭绝性地仇杀，它是党性杀人，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发展到极致的一个必然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被